

理论与实践

LILUN YU SHIJIAN

广东 7-22



7

一九五八年七月

目录

論 著

- 关于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李 超(1)
- 談思想解放和思想工作戈 枫(7)
- 論“政治挂帅”张其光(11)
- 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李又华(15)
- 南共修正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杨 群 史 汀(21)
-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跃进的关键孙 孺(28)
- 对唯物辯証法的范畴—概念的理解燕 丘(31)
- 墨家論“辟、侔、援、推”李匡武(35)
- 考工記的“輪人”侯 过(39)

討 論

- 从陈白沙的詩詞論証他的哲学思想聞 峻(42)

調查与研究

- 广东新軍的“庚戌起义”王在民(48)

書 刊 評 介

- 介紹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文集屈 辛(51)

短論与隨笔

- 迷信种种介 文(54)
- “博学”与“堆积材料”河 山(55)

从讀者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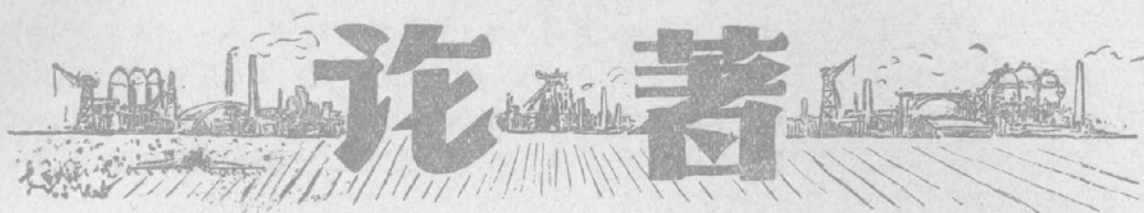
- 有关“广东护国軍”的一件史料刘宁溪(27)

問 題 解 答

- 关于陈白沙学术地位和生平事迹的問題(56)

动 态

广东各地加强理論工作
中山大学展开教学改革运动



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李 超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

“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他们迫切地要求摆脱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障碍。鉴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获得胜利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这就是说，我国的革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从现在开始，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以最大努力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英勇进军，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进行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和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我们的国家原来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和文化都是落后的。经过八年多时间的建设，我们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的，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仍然落后，人民的生活也还不富裕。1955年到1956年进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灭了

资本家的私有制和农民及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农民及手工业者集体所有制，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了社会和大自然的主人，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1957年以来进行着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进攻给予粉碎性的反击，而且同时地改善了生产关系，使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于是就出现了去冬今春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大跃进面的新形势。

当了家、作了主、提高了觉悟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等口号的鼓舞之下，大家在劳动中，在工作中鼓起了冲天干劲，充分显示了移山填海、征服自然的决心和威力。

因为大跃进，需要的劳动量是大大地增加了。据湖南省桃江县的调查，该县1957年实际劳动量是1,900万个劳动日，为了实现大跃进，今年需要的实际劳动量就至少要5,882万个劳动日，比去年增加两倍有多。其他地区也有同样的情况。广大群众依靠苦干和改进劳动组织，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是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的。但是，这个解决有其限度。仍以湖南为例，劳动利用率和劳动强度提



高以后，全省还有20%、30%甚至40%的劳动“赤字”。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仍然未有彻底克服。因此，在大跃进当中，“干劲”就引起了“鑽劲”，广大劳动人民在提高劳动强度和提⾼劳动利用率之后，就要向技术革新繼續前进。于是我們见到：工人农民都在开动腦筋，他們“拿起工具想改进，个个心底思发明”。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展开了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正如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民群众已經行动起来，在許多地方，征服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伟大进军，已經轟轟烈烈、蓬蓬勃勃地开始了。”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任务的提出，又一次体现了毛主席的“不断革命”的思想。

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特別作了說明。刘少奇同志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經多次指出，工人階級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及时地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使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不致在中途发生停頓，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不致因为革命的間断而冷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不致因为满足于既得的成就而生长起驕气和暮气，——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長时期以来，就是用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还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夜，党中央就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決議中，明确地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轉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紧接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党中央在1951年12月就指出了在农业方面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实现集体化的道路，并且在1953年向全国人民大规模地宣传了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党中央又提出了和实行了在思想战綫和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一切，都使革命不失时机地从一个阶段前进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胜利前进到另一个胜利。提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这就是說，我們不断发展的革命，现在又需要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已經接連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现在又开始新的胜利的大进军了。

发动一个技术革命之所以迫切需要，是因为經濟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获得胜利之后，我們要巩固胜利和发展胜利，就要立刻行动起来，和帝国主义搶时间，比速度，用最高的速度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設。要⾼速度地进

行社会主义建設，最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呢？是如何迅速地发展我們的社会生产力的問題，是如何采用新的技术来提高我們的劳动生产率的問題。关于这一方面的問題，列宁曾經这样教导我們，他說：“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已經解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在大体上和基本上得到解决的程度，必然把創造高于资本主义制的社会經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証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毛主席在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中也曾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經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經济面貌全部改观。”

现在，我們就是要进行“使社会經济面貌全部改观”的技术革命。这个革命要做些什么呢？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把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明确提出来了，那就是：要“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內的全国經济有計劃有步驟地轉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轉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鎮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專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網和邮电網。在尽可能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結合起来。”

这是全国机械化、电气化、工业化和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宏伟的綱領。实现了这个宏伟的綱領，我国的工业將是高度机械化的工业，大部分的手工业將轉变成现代工业，农业劳动也大量使用机器。那时我国人民將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將大大地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將大大地发展；那时我国城市和农村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將广泛地使用电力；那时我国將出现一个星罗棋布的现代工业網，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將比现在大为縮小。我国的工业产值將大大超过农业产值，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头。同时，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將是四通八达，运输、走

路、通信、通話都將便利得很了。

目前，由城市到农村，轟轟烈烈、蓬蓬勃勃地普遍展开着的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已經为技术革命作了一个伟大的开端。去冬今春以来，广东的农具改革运动，就把耕作工具、运输工具、提水工具和加工工具从粗到細，从簡到繁，作了系統的改革。經過改革的农具，以几倍甚至几十倍于以往的工作效率，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海南島的琼东县，往年夏收要投入30,000多个劳动力，經過农具改革今年只要投入18,000个就够了。劳动力比往年减少了40%，夏收时间却比往年縮短了10多天。而且因为减少脫粒損失，每亩还可以多收稻谷7至8斤。在工业战线上也是这样。在今年的头四个月，广州市工厂企业和手工业的职工、社員，就提出了革新技术的建議17,000多件。这些革新技术的建議，包括改进生产技术和操作方法、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設備、改进設計、改变配方以及創造发明等許多方面，使生产效率提高几倍以至几十倍，使产品质量得以迅速提高。广州造纸厂青年工人謝裕穎創造了3小时零5分蒸煮一鍋化学漿的全國新紀錄，就使該厂每天产量增加了20吨。广州通用机器厂张明汉青年突击小组把煉一爐鋼的时间从4小时57分縮短为1小时零5分，就使鋼的产量翻了几翻。华南制鎖厂工人光是改进电鍍操作法一項，就使一个人的工作能頂得上18个人的工作。江門机械厂职工王角，單只制造自动化滾筒一項合理化建議，就使生产效率提高了10倍。因此，劳动人民自己对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运动作了很恰当的評价。他們說：“新工具，真正好，节省人力效率高，落后工具都改掉，社会主义早来到。”

因为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結果，生产跃进计划得到了可靠的物質基础和技术保証，跃进指标可以不断地提高；而跃进指标的不断提高，又反过来要求工具和技术不断的改良和革新。大量渐变性的改进和革新，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飞跃性的进步，量变发展成質变，工具改良和技术革新就发展成技术革命。在农具的改革当中，有很多是已經帶有革命的性質的。例如“車子化”用車子代替了簡單工具的扁担，就是一个飞跃性的革命。又如佛山市的絲織木机，本来是用人力操作的，在群众性的技术改革运动中，工人把人力操作的木机改为电动，半机械化向机械化发展，实现了进一步的技术革命，生产也就跟着提高了整整一倍。所以，在技术革命中，我們必須十分重視这些大量出现的萌

芽，十分重視这个伟大的开端，使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更深入、更广泛和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把它引导到技术革命的大飞跃。

但是，要使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还須有一个文化革命运动和它相輔而行。因为进行技术革命不只需要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还需要广大群众具有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广州市郊区的黄陂乡，今年要兴建好几个沼气发电站和水力发电站，机器买好了，但是不懂得設計和施工，碰到許多困难，解决不了，結果延誤了施工的日期。該乡黄陂社要搞一个沼气发电站，曾經特地派了乡里認為最有文化的人到番禺县去参观，可是限于文化水平，回来后还是不能动工兴建。后来請来一位施工員，再次前去参观，才由那位施工員协助把沼气发电站兴建起来。黄登社要搞一个水力发电站，也因为找不到一个高小毕业程度的人材，技术上碰到不少困难。这些掌握技术所碰到的困难，促使劳动人民强烈地要求学习文化，学习技术，要求攻破文化、技术的堡垒，以便自己能够成为文化科学的主人。目前許多厂矿，同样存在生产迅速发展和技术力量不足的矛盾；新的厂矿不断涌现，也急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新軍。而在搞发明創造时，由于缺乏文化科学知识，职工們的創造才能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創造出来了，要想加以总结提高，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因此，許多劳动人民感慨地說：“社会主义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

关于这，列宁也是早就指出过了，他說：“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內，是建設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他在教导青年人时又會着重地說过：“必須認清，只有在现代知識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通晓这种知識，那共产主义就始終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因此，刘少奇同志在所作的报告里指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时进行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專区和許多的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消灭‘四害’，講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培养新知識分子，改造旧知識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

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

一個聲勢浩大、氣象萬千的文化革命，目前實際上也是已經在各地迅速開展起來了。普寧縣僅僅以45天的時間，就攻下了向來認為“欲速不達”的“掃盲關”，成為廣東省第一個無文盲縣。江門市萬人教，萬人學，苦學47天，也成了全省第一個無文盲市。截至5月底止，廣東各地已經辦起民辦小學13,555所，吸收了81萬多學齡兒童入學，興辦起來的農業中學和其它職業中學、業餘中學也有6,000多間。今年要興辦的，還有高等學校20多間。汕頭專區听了“八大”二次會議的傳達，決定要在全專區範圍內迅速掀起一個群眾性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大高潮，要做到社社辦中學，社社辦紅專學校，縣縣辦工業技術學校，專區辦工學院分院和農學院分院、醫科專科和師範專科學校，專區和縣成立科學普及委員會和舉辦科學研究所，鄉成立農業技術工作站，社成立農業研究小組，並且在今年就要在全專區範圍內完成掃盲和除“四害”的任務。電白縣林頭社一個社就辦起了農業科學研究所來。城市的工人為了向文化進軍，也紛紛成立科學研究小組和理論學習小組，廣泛地開展學文化、學技術、學科學、學理論的群眾性活動。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正在迅速形成，舊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運動正在迅速發展。與此同時，除“四害”講衛生運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從1月起至6月止，全省就滅鼠3,740多萬只，滅雀2,100多萬只，滅蚊79萬多斤，滅蠅186萬多斤，清除垃圾兩億多噸，顯著地改變了城鄉環境衛生的面貌。這些奇跡似的、神話似的事情，這些人們過去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現在都在短短的時間之內一下子大量湧現出來了。這就是勞動人民的文化大翻身，這就是文化革命的干劲。這個和技術革命相輔而行的文化革命，將如技術革命改變我國的經濟落后面貌一樣改變我國的文化落后面貌，它將使我們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獲得最迅速的發展。

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很艱巨的任務，以為在一朝一夕之間，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它完成，那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但是，以為任務既然艱巨，就只好慢慢地來，那也是不對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和一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樣，必須按照多快好省的總方針去進行，必須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在尽可能短的時間內加以完成。而要這樣，就有幾個重要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和澄清。

首先一個問題，是對於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采

取怎樣的看法的問題。

勞動人民到底能不能夠掌握科學技術、掌握文化知識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科學技術以及全部文化知識並不是什麼神秘的、高不可攀的東西。科學技術以及全部文化知識都是來源於社會實踐和物質生產，歸根到底，這些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勞動人民。在舊社會里，剝削階級佔了勞動人民的勞動果實，剝奪了勞動人民學文化受教育的權利之後，他們就把自己裝扮成最“聰明”最“高貴”的人，好像只有他們才會懂得科學技術，才配掌握文化知識；而勞動人民，倒反被他們看作“愚昧無知”、不配享受一切“精神文明”的“下等動物”。

但是，事實真相到底如何，現在我們不是清楚看到了嗎？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在大躍進中，發明創造，層出不窮，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驚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能力。現在為人所熟知，當了中山大學教授的李始美，他的根治白蟻的方法已經超過國際水平，但是他原來不過是一個只念過一年初中的農村青年。發明八用加工機的曹文籍，是一個只念過四年書的“鄉下人”。在農業科學上有顯著成就，成為農業科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的王保京，也是一個只念過三年小學的貧農。掀起技術革命高潮，新產品新技術不斷超過國內外先進水平的天津織染廠，廠內16名有重大技術改革成就的工人，從他們的文化程度上看，其中小學程度的3人，初中程度的3人，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6人，並沒有什麼專家和大学生；從他們的年齡上看，18歲到24歲的8人，剛好是16人的一半。這些實際事例有力地作了說明：一切把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看成神秘的東西都是沒有根據的；在攻取科學文化堡壘的時候，一切迷信和自卑感都是錯誤的。勞動人民只要破除迷信，砍掉自卑，鼓足干劲，力爭上游，苦學苦鑽，注重實踐，無論最新最深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都是可以為我們所逐步掌握的，我國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是一定可以在我們這一代勞動人民的手里實現的。

其次一個問題，是採取什麼樣的路線來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問題。

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群眾路線，一條是非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多快好省的路線，非群眾路線是少慢差費的路線。群眾路線與非群眾路線之爭，表現在技術革命上，是必須依靠群眾還是只能依靠專家的問題；表現在文化革命上，則是必須全民來辦文化教育還是只能由國家

来办文化教育的問題。

走群众路綫，大家的事大家办，这是我們实现任何革命任务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根本路綫。因为革命是千百万群众自己的事情，建設同样也是千百万群众自己的事情，如果不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发动起来，使人人都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能把革命和建設的任务多快好省地完成的。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广大群众的最大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也必須是一个全民性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一个全民性的群众运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技术革新运动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觉悟起来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有了主人翁的責任感，这种觉悟反映到生产上去，就是千方百计要使自己变成自然的主人，千方百计要使自己的劳动产生更大的效率，好为建設社会主义作出更多的贡献。正是存在着这个伟大的愿望，他們迫切地要求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而无数的发明創造，就是这样涌现出来的。在文化革命的进军中，也是同此情况。当广大劳动人民深切体会到有掌握文化知識的必要，知道“文化是庄稼宝，有了文化就能生巧”，于是学习文化的运动就如火如荼。过去办学校沒有地方，现在要地方就有地方。过去办学校沒有教員，现在要教員就能找出教員。过去要学习說是沒有時間，现在“課本随人走，群师（群众教师）跟着跑，到处是課堂，有空便学习。”为了解决紙笔、課堂、黑板等缺乏的困难，群众創造了“五变”的办法：手变笔，地变紙，飯桌变黑板，工地、田头变課堂，牆壁、用物变課本。夫妻同学，父子同班，婆媳共桌，已經不是什么罕见的美談，而是全民攻打“文化关”中的普遍现象了。

我們強調群众路綫，決不是輕視技术專家在技术革命中的作用。为了把国民經济轉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我們是必須建立一支又紅又專、既包括从工农群众中培养起来的新專家、又包括正在改造中的旧專家的技术專家队伍的。但是，在培养新專家和改造旧專家的同时，我們必須放手地搞起轟轟烈烈的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才可以更快地培养出工农出身的新專家，而且因为在群众性的技术革命中，可以推动理論脱离实际的旧專家多多接触生产，帮助他們改造成理論联系实际的、又紅又專的技术人材，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技术專家的积极作用和更有效地发挥技术的威力。

我們強調群众路綫，在文化革命中，国家机关

和党組織必須善于組織和調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之能够持久；必須善于帮助群众总结經驗，使之能够逐步提高。在向文化革命进军中，有些具体問題自然需要国家及时給以支持，为之解决困难。但是，所有这些，都不等于事事只能依靠国家来办。对于扫盲、普及小学教育等工作，認為必須由国家来办的人，现在是很少了；可是对于办中学，特别是办大学和科学研究机关，認為只能由国家来办的人，现在还是有不少的。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当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不只專区能办大学，县也办起大学来了。四川省的广安县，就是四天之内建立了一所广安大学的。因此，正确的方針应该是中央办，地方也办；国家办，群众也办；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結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化教育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起来，尽快地实现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

第三个問題，是采取什么样的方針来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問題。这里面主要是提高和普及的关系問題，也就是如何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具体贯彻多快好省的总方針的問題。

在技术革命中具体贯彻多快好省的总方針，首先碰到的，就是如何正确对待现代最新技术和原有設備，如何对待土办法和洋办法。

我們的技术革命是从我們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的。我們国家原来技术基础比較薄弱，而目前广大群众对于革新技术則有着十分迫切的要求。从这样的情况出发，我們一方面必須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的最新技术成就，使用洋办法，以便尽可能快地把全国經济轉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根本改变工业和农业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又必須充分利用原有設備，使用土办法，在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这样来使我們的主要工业部門获得现代化的最新技术装备，又使广泛的手工劳动和众多的旧設備的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得到增長，并且为轉向现代大生产准备条件。因此，我們进行技术革命的方針，就应该是洋办法和土办法同时并举，在尽可能地采用现代最新技术成就的同时，充分利用原有設備，在城市广泛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并且着重于群众的技术革新。

在文化革命中，同样的問題是如何正确地使普及和提高相結合。我們的国家文化落后，直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人沒有脱离文盲状态，还有很多人达不到初級小学的水平，他們现在对学习和提高文化的要求非常迫切。但是他們在美丽的共产主义远景

鼓舞下，已經不满足于睜眼識字，還要進一步向文化科學進軍。而且我們的文化科學事業也必須迅速前進，以便配合生產技術的改革，大大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並且使科學技術在十二年內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水平。因此，我們的文化教育事業必須大力普及，在普及的同時，也必須注意提高。因為不普及，勞動人民不能掌握最起碼的文化科學知識，社會生產力就得不到進一步的提高；但是只普及，不提高，勞動人民要進一步向文化科學進軍和更迅速地發展生產的要求就不能達到。而且普及和提高是對立的統一，是交互地作用着的。一個地方，文化教育事業有了普遍的發展，就要鞏固和提高；當廣大群眾文化知識普及到一定程度，他們就有更高的要求，就提出提高的任務。因此，我們進行文化革命的方針，就應當也是提高和普及相結合，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而目前則更須着重普及。執行這個方針，由於它符合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可以把群眾的力量和積極性更好地發揮，同時又可以把國家的力量有效地重點使用，這樣就從而能夠多快好省地實現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

最後一個問題，是政治掛帥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問題。

毛主席教導我們：“思想工作 and 政治工作永遠是一切工作的靈魂和統帥”。沒有了“靈魂”，失卻了“統帥”，就等於一只迷失了方向的海船，不只達不到目的地，而且還有中途復沒的危險。因為革命也好，建設也好，事情總是要人來做的。人，始終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沒有正確的思想，沒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怎樣能把積極性和創造性發揮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面呢！所以技術革命、文化革命，必

須先來一個思想革命，而且今後在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當中，還要不斷地展開新舊思想的鬥爭，使新思想戰勝舊思想，使人們的思想獲得解放，使過去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現在敢想敢做；使人們都成為富有思想活力，充滿創造精神的新時代的建設者，以此來保證兩個革命的勝利和成功。

政治掛帥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必要，還因為應該預先估計到，強調了向技術進軍，向文化進軍，忽視政治的傾向可能出現，只專不紅、先專後紅的錯誤思想又會抬頭。這些錯誤傾向、錯誤思想的出現和抬頭，將會使一些人迷失方向。因此，必須把又紅又專的口號作為整個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時期的口號，必須不斷強調指出：技術是為政治服務的，文化也是為政治服務的，任何科學文化和技術業務都不能脫離政治，不能脫離黨的領導。只有“統帥”就位，方向對頭，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才能勢如破竹節節勝利。

劉少奇同志在他所作的報告里指出：“積極實現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積極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將使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大大地發展起來，將要大大地提高我國的勞動生產率，使我國工業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使我國農業在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使我國科學和技術在實現‘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儘快地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水平。”我們現在正在做着前人所未做過、未想過的偉大的事情，那末，讓我們人人都積極行動起來，熱烈地響應黨的號召吧，我們必須千鈞百倍地勇奮前進！

談思想解放和思想工作

戈 楓

我国过去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因为“穷”，我們的建設投資，就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白”，我們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在大规模的建設过程中，就难免要遇到一定的困难；再加上我們所从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还缺乏足够的經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能不能把建設的速度大大地加快呢？有的人就难免要发生一些怀疑。在他們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因此，他們主张把建設速度放緩些，慢慢地摸索經驗，慢步前进。

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建設速度加快的某些怀疑，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近百年来，由于过去历代反动政府的腐敗統治，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历次侵入和压迫，使我国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很大的摧残，因而产生了疑惧和自卑之感，妄自菲薄；对所謂“洋人”則产生了迷信思想，盲目崇拜，总認為人家行而自己不行。这种自卑心理和盲目崇拜洋人的思想，在解放以来的几年中，虽然有了很大程度的克服和轉变，但是，这种有害的思想，在某些人的头腦中，終究还保留着它的烙印，并未完全清除，它还象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似的，束縛着这些人的头腦，使他們不敢放开头腦去想，放开胆子去干。因此，对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他們就表示了某些怀疑。

自卑心理和迷信思想，这些束縛人們头腦的“金箍”，必須首先彻底打碎。否則，就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建設路綫，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正因为这样，所以說，思想解放是贯彻执行总路綫的一个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其实，妄自菲薄和迷信洋人，在我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在中国的工人階級來說，并没有这种不良的思想传统。当外国人还没有想到的时候，我国劳动人民就敢想、敢做地把造纸、印刷术、指南針和火药等东西創造出来了。当外国强盗蛮横地用洋枪、洋炮攻打进来的时候，我国劳动人民也并未屈服，而是赤手空拳，或手持棍棒地去奋勇迎击敌人。我們广州三元里的劳动群众，当年痛歼来侵的英国强

盜，就是最好的証明。当中国人民头上还压着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那个时候，中国工人階級（以共产党为代表），就敢想、敢說、敢干地发誓要把这三座大山推倒，要抬起头，挺起胸，翻过身来。现在，这一理想已經实现了。

事实証明，敢想、敢說、敢干，这才是我国工人階級及其它劳动人民有光荣传统的思想。同时，无数事实也証明，只要敢想、敢說、敢干，万事皆可成功。当初，如果没有人敢想过要上天，今天就不可能有飞机在天空飞行；人造卫星也不会穿过大气层而在高空运转。今天，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时候，为什么我們不可以把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加快，而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呢？正象毛澤东同志所說，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則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紙，沒有負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今天，要使思想解放，首先必須相信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是可以多快好省地进行的。当然，我們所說的“相信”絕不是盲目的相信，而是有根据的相信。因为，第一、我們有党和毛澤东同志的正确領導。第二、我們有六亿多勤劳而有智慧的人民，他們又有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望。这两条是我們一切事业成功的两个根本的条件。第三、我們建設社会主义已經有了几年的时间，积累了不少的經驗——总路綫就是几年来建設經驗的总结。万事开头难，现在是可以加快速度了。第四、我們国家資源丰富，面积辽阔，便于进行建設。第五、我們有苏联及其它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援，特别是在技术方面，我們自己一时还不能解决的，都可以在他們无私的帮助下来得解决。我們有了以上的“五好”，即好的領導、好的人民、好的經驗、好的資源和好的朋友，我們就可以在这块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創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来。我国鋼鐵生产，由解放初期年产量只有十几万吨提高到今

年的七百万吨以至上千万吨；亩产粮食，由过去的几十斤、最多几百斤，而提高到今年的几百斤、上千斤，以至数千斤的水平，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水平啊，但是，现在都是铁的事实，而且这也不是我們所理想的最高水平。这些惊人事迹，在广东省的范围内，也是举不胜举的，每天打开报纸来看，建设速度进展之快，真是令人惊讶！所以说，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是完全可以加快的，这是不应当有任何怀疑的。

要使思想解放，只是“相信”建设速度可以加快，这还不够的，还应当自己下决心这样做；为此，就要加强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责任感。因为，只有有了坚强的责任感才会自觉自愿地、挖空心思地肯想和敢想，肯说和敢说，肯干和敢干。否则，如果只是承认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加快”和“应当加快”，但是，却让别人去“加快”，而自己可以除外，自己可以放慢工作的速度，那么，思想还有什么解放的必要呢？又何必去苦想、苦干呢？

解放思想，对我们干部来说，主要是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框框中解放出来。

有的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才能，也不相信群众的智慧，他们相信的只是白纸黑字，书本上的东西。一谈到搞工业、弄技术，他们就要到书本中去找根据。如果找到了根据，就信而无疑；如果找不到根据，他们就摇头不信，表示怀疑。他们不但迷信死书本，他们也崇拜“活书本”，即对某些书本知识较多的专家，一言一语都确信无疑，对职工群众的创造和倡议，则不够相信。总之，他们的头脑，被死的条文给缠住了。

与上述那种人相反，有些人只相信自己的所谓“亲身经历”，别人的知识和书本上的东西——别人经验的总结，他是不相信的。他们对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能力，也是不相信的。有的人对群众的不相信的程度，使你都不敢相信，这可叫作：使人不敢相信的“不相信”。例如，广州市某工厂，工人要求改变生产过程，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厂长却不相信可以成功。他说：如果能搞成功，我的脑袋都不要了。结果呢，工人搞成功了。当然，象这样典型事例，是少数的。

在党内来说，如果可以說教条主义已经搞臭了的话，那么，经验主义却还有相当的市场。其实，正象新华社通讯社六月二十二日由北京发出的一条消息中所说：“经验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经验主义是最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最盲目的实际主义者”。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共同点，就是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在搞工业建设方面，则都是有严重的迷信思想。这种迷信思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迷信大的、新的。一提起工业建设来，有的人马上就联想到曾经参观过的、或在电影的银幕上所看到的鞍钢或武钢的大规模和新设备来了。他们认为，只有那样的规模和设备，才象个工业建设的样子。至于小规模、土办法、旧厂房，他们就不放在眼里了。这在当前来说，当然是一种有害的思想，也是违背总路线所规定的大中小相结合又以中小型为主的方针的。

其次，是迷信设备。认为非有一些象样的设备不能动手搞工业，而不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原有的基础上想办法去搞。因此，只能张口向上叫，伸手向上要，坐等设备的到来了。

再次，是对专家和技术人员过分迷信。认为没专家和技术人员就不能搞工业，特别是不能搞象炼钢铁、造机械等工业。他们不相信职工群众的智慧，不相信今天还不是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工人群众，在实践过程中、经过锻炼后也可以成为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许多生产关键问题，专家、技术人员无法解决，而由普通的工人解决了。这样的事例，只要翻翻报纸就可以随手而得。

再次，是迷信劳动力的数量，认为劳动力不足，很难大规模地搞工业。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他们只看到表面的具体人的数字，而没有把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潜在力量估计在内。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人民解放军一个战士，可以战胜国民党军队几个士兵，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我们思想工作做得好，劳动组织搞得好的话，为什么不可以使一个工人顶几个工人使用呢？生产翻一翻，以至翻几翻的工厂单位，难道他们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而大批增加工人来的吗？当然不是的。所以说，迷信劳动力的数字是有害的，实际上是对生产的一种消极态度，也是不符合总路线的精神的。

最后，是迷信“潜力到顶论”。有的人说，解放几年来都是想办法，挖潜力，找窍门，哪里有这么多的办法、潜力和窍门啊？就是有的话，也早已想完、挖完和找完了，还能总有！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相信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但又不是一下就可以完全认识到的。就以牛粪可以喂猪的问题来说。牛粪是自有牛

的那天起，就早已有了的，而且今天的牛糞比以往的牛糞，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可是，在過去却並沒有人知道牛糞也可以作飼料；而今天却發現了它有這個用途。這就是我們認識客觀世界的一個發展的證明。類似這樣的事例，從生產大躍進以來，多得很多。由此可見，什麼辦法啦、潛力啦、窍门啦，並不是一下就可以找窮挖盡的；相反，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多之無窮，找之不盡，挖之不盡的。當然，對於那些不肯找它、挖它的人來說，它們都是極為有限的。

在我們今天所處的时代——人造衛星的时代，人造纖維的时代，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时代，巧婦是可以作無米之炊，是可以異想天開的。問題是：你敢不敢，有沒有這種勇氣。正因為這樣，所以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導我們要敢想、敢說、敢干。如果有了這種“三敢”的精神，那麼，以上的各種迷信思想，也就可以逐步打破，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可以神速猛進。

但是，敢想、敢說、敢干，它的前提應當是：“為了社會主義”，“為了興無滅資”。在“敢”的過程中，還應當有“求實的精神”。什麼是求實的精神呢？這就是實事求是，踏踏實實，切切實實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敢想、敢說就會變成空想、空說，敢干就會變成盲動和造成浪費。所以，無論什麼事情、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應當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所以“敢”的效果，堅定“敢”的信心，鼓起更“敢”的勇氣來，以便貫徹執行總路綫，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向前飛躍發展。

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除思想解放以外，發動群眾也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

群眾路綫，是黨的政治路綫、組織路綫和階級路綫。群眾路綫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無論什麼工作，只要以群眾路綫的方法進行，就可以搞得更多些、搞得快些、搞得好些。在進行武裝鬥爭時是這樣，在進行土地改革時是這樣，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也是這樣。當今天我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也必然還是這樣。

走群眾路綫進行工作，在我們黨內是有光榮傳統的。但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工業的時候，有的人會對用群眾路綫的方法，多少發生了一點懷疑。他們認為：搞工業對我們來說，還是一種新玩藝兒，沒有經驗；同時，工業是要有技術的，它又是一種高度集中的事業，所以，還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就不行了。因此，他們主張：工業建設應由國家、

由少數人去搞。

這種主張，當然是十分錯誤的。恰巧相反，正因為工業建設在我們來說是新玩藝兒（今天的情況已有所改變），沒有經驗，缺乏技術，就更應當儘可能廣泛地發動群眾來搞，以便大家創造經驗和逐步掌握技術。至於工業生產比較集中，這更應當是發動群眾來搞的有利條件之一，因為比較集中，就更方便領導，而不致發生什麼大的問題。所以，不應當把工業生產集中當作不走群眾路綫的借口。

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基本點，首先提到的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是什麼意思呢？實際上也就是走群眾路綫的問題。因為只有把各方面的群眾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萬眾一心，同心協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能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建設的速度才可以大大加快。

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具體如何走群眾路綫呢？這主要是認真貫徹“三個並舉”的原則，即“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同時並舉”。這也就是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但要充分發揮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和幹勁，還必須同時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幹勁。農民在全國六億多人口中占五億多（全廣東省三千多萬人口中，農民也是占絕對多數）；輕工業許多原料和城市群眾的食糧等，都是來自農民之手；而農村又是工業建設勞動力的供應地和工業品的主要銷售市場。所以，建設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幹勁，那是不可想象的。其次，中央和地方（而在地方上又是上級領導和下級領導）同時舉辦工業，也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大家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性，並且也便於彼此之間互相開展革命競賽，看誰的生產和建設搞得既多又快，既好又省。再其次，關於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同時並舉的問題。這樣作，既有大型企業作骨幹，以提高中小企業的技术裝備水平；同時大型企業可以得到中小企業的支援，而更便於發展。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小企業和大型企業同時舉辦，更便於調動一切力量而促進工業建設的速度。因為，中小企業投資少，用的勞動力也少，但建設得快，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收到實效；廠房建設可以接近原料產地，產品也可以適當地滿足當前當地的急需；此外，因為設備簡單，技術水平要求較低，這就便於廣大群眾動手搞。

所以，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就可以使建设速度大加快，企业数目大大增多，分布面大大广泛，使工厂遍地开花，形成群众性的工业建设运动。我们不妨以广州市的钢铁工业建设的发展情况来加以说明。广州市的钢铁工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原只计划建立一个钢铁厂，即“广州钢铁厂”，每年产钢不过50,000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指出要大中小型企业同时举办，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了，不但广州钢铁厂的年产量比原计划提高数倍，而且冶炼钢铁成了带群众性的运动。到6月底止，已经炼出钢铁的单位，就有50个左右。其中有的是工厂，有的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的是财贸部门，还有的是学校。现在所炼出的钢的品种，不仅有普通钢，也有高级钢和特级钢，如矽钢、磁钢、不锈钢、高锰钢等。不但在市区内可以炼钢炼铁，郊区农村也可以大搞炼钢炼铁。广州郊区在今年9月底以前，就将建立土高炉108座，其中30座将在7月份建成。这108座土高炉建成后，将年产生铁80,000多吨。现在，广州市的钢铁工业建设，由于执行了党的大中小型相结合、又以中小型为主的方针，所以，广州市钢铁的年产量，将不是原来计划的50,000吨，在1958年就是力争生产40万吨的问题了，即比原计划增加8倍。这个数字是否最后的数字而不会再增加了呢？现在尚难预料。因为，象前面所说，冶炼钢铁已成了带群众性的运动，当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挥的情况下，生产指标当然还是会上升的。这是执行党的正确方针的结果，这是群众路线的伟大力量，这也是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万分正确的再次证明。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尽管是百灵百验的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尽管我们在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时候，更十分需要走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从而自觉地遵守执行的。有的人，他们对总路线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他们的干劲也的确可以说鼓足了，但是，他们却不注意或不善于去设法鼓足群众的干劲，使群众自觉自愿地同自己一齐来干。他们所以这样，有的是因为他们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虽然经过这次整风运动，但并没有认真加以克服。有的则认为，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大大提高，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已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可以不必要再作什么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了。其实，这两种思想认识和作法，都是不对的。

群众的干劲，可以有两种方法取得。一种是压

服的方法。用这种方法，群众的思想虽然不通，但由于群众感到有某种压力，所以也拿出一些“干劲”来。但是，这只能说是群众鼓起了一些干劲，不可能达到总路线“鼓足干劲”的要求，而且这种干劲也是不能持久的。取得群众干劲的另一种方法，是说服教育、打通思想的方法，即不但要使群众做些什么，还要使群众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与不这样做对国家和对群众自己有什么不同的结果，从而使群众自觉自愿地拿出干劲，全力以赴。这样的干劲，不只是会鼓起而且是可以鼓足和持久的。在这种干劲下，从长远来看，生产、建设速度之快，数量之多，质量之好，是同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比拟的。

认为群众觉悟提高了，就可以不再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这种说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是的，经过整风与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群众觉悟比以前是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是否因此群众中就再没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了呢？当然不会是这样。只能是落后面大大的缩小了而已，而不会是完全消灭了落后面。例如，当总路线公布以后，群众的反映就不完全是一样的。绝对多数是热情欢呼，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的；但个别也有的说：“总路线好是好，就是执行起来太辛苦。”有的说，“劲已鼓足了，不能再鼓了。”至于一般的思想问题还会多些。例如，有的认为多快和好省是对立而不能统一的，要多快就不能好省。也有的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青年人能作到，年纪大一点的不行了。等等。由此可见，认为群众觉悟提高了，可以放松思想工作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只要有领导和群众、先进和落后之分，就需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不会过时。一万年以后，人们还会有领导和群众，先进和落后之分（尽管在含义上同今天有所不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动员群众的思想工作就还是需要的。

事实证明，当广大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了的时候，当绝大多数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干劲冲天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忽视对群众中的落后部分的发动工作，就容易把工作方式简单化。正因为这样，所以，关于思想工作和群众路线的问题，就还有加以强调和大讲特讲的必要。特别是在宣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时候，更应当如此。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能否真正加快的重要问题。

論“政治掛帥”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学习筆記

張其光

“政治掛帥”这几个字，艺术地描写了，也真实地反映了我們的一切工作无非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而斗争。我們在工作中組成庞大的战斗队伍，各方面的工作形成一条条战綫，每个工作都体现一次战斗，必須有个統帥，才能明确方向，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也只有这样，才能胜利。所以說：政治是灵魂，是統帥。

为什么必須強調“政治掛帥”呢？

一年以来的全民整风运动是极其广泛的巨大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政治战綫上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波瀾壯闊的整风运动，大大地推动了一切工作，大大地教育了全国人民。人們的政治方向明确了，思想觉悟提高了，政治热情充沛了，干劲鼓足了，一切事业、一切工作就出现大跃进的局面。“在我們国内，象大家所看到的，党所領導的按照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而展开的整风运动，已經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个战綫上获得了伟大成就。……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有系統地調整人民內部的关系，使它适合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整风这条总綱带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发展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而全民整风高潮，又进一步地推动了全民生产和建設的高潮。”①整风运动，也就是在我們一切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政治掛帥”的严重斗争，这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巨大力量及其作用，有时并不那末显而易见；但在我們的实际工作效果中具体地体现出来的时候，人們就会恍然大悟。展开在我們眼前的一幅生产和建設事业的壯丽的图画：工业大跃进，农

业大丰收，政权大巩固，文化教育遍地开花，所有我們工作上的“奇迹”，是从何而来的？还不是經過整风运动政治挂帅的結果？

最近，中央国家机关在整风运动中全面“論虛”出现了共产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新局面，更足以說明“政治掛帥”的威力。“由于加强了对整风运动的具体領導，上上下下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发动，人人談政治，人人談思想，这就使多数單位很快地抓住了本部門业务工作中的根本性問題，就事論事的整改方法改变了。例如生产管理部門大都在辯論應該按照什么路綫和方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商业流通部門提出應該怎样加强生产观点，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医生們在检查过去为什么治病却不为病人着想，公安干部在辯論應該怎样树立做人民勤务員、人民警卫員的思想，等等。事实証明，各部門工作中的根本性問題要能看得准，抓得起，关键在于充分地发动和解放領導干部的思想。”②任何工作部門都有它們自己的独特的业务，工作性質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必須看到：在我們的各項工作中都存在着內在联系，那就是政治内容和思想内容。这里引述的关于中央国家机关整风的报道証实了这个道理。無論什么工作，都有着“路綫”，“方法”，“观点”，和“态度”一系列問題，总起来說，就是个政治上思想上的立场問題。經常注意和掌握一切工作的政治方向，积极而正确地进行思想工作，从而确保各項业务达到政治目的；收到政治效果，那就必須首先意識到任何具体的实际工作都渗透着政治意义和思想性。对于具体业务即使十分熟練，如果不从政治意义上来了解它，也不能

① “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工作报告”（着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以下各引文凡有加重点的均同。）

②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0期25頁。

真正做好它。各級党委对于許多具体工作的指示經常提高到政治意义上来分析，指出某項工作是一个政治任务，凡是体会得好的便貫徹得好，而体会不好或不够的，便貫徹得不好或不够好，这是常见的事情。所以說：政治是灵魂，它滲透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即使并不那末显而易见，毕竟是潛在着的支配力量。看不到这个“灵魂”的实际存在及其作用，就不可能深刻地認識到“政治挂帅”的主要性和必要性。

以广东新会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設县城为例，他們能够打破那种“城市建設不能多快好省”的錯誤論調，又是什么原因呢？“几年来，会城鎮党政領導善于运用各种方法向群众宣传生产建設，宣传城市建設，从而使党的方針、計劃深入人心；群众对于各项建設热情高，干劲足。由于群众踊跃参加劳动，原来計劃要花几万元为时八年才能完成的下水道整治工程，在去冬短短的几个月時間內用九百多元就完成了。”①这又是“政治挂帅”显了“圣”。人們完全可以体会到党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做得好確能“大显神通”！

最近在广东佛山举行的全国饮食业推广薯类制品现场會議，人們看到了“番薯鬧革命”的奇观，同时看到了“政治挂帅”的威力了。第二商业部饮食服务局副局长罗家鎬說得好：“广东推广薯类制品走在全国最前面，插上了紅旗。广东省推广薯类制品經驗的基本点是：依靠党的領導，政治思想工作_在饮食业中挂帅，方針明确，措施具体。提出‘以杂粮变主粮，讓番薯登宝座’，和‘人人吃番薯’的响亮口号，深入人心。”②商业工作的政治意义过去一般地容易被人忽視，饮食业也不例外。番薯与革命連在一起来提，成了“番薯鬧革命”，这只有从政治意义上才能得到確切的了解。可见，事情有了“政治挂帅”，真是了不起！那些“见物不见人”的人，事情到他手上就很难“政治挂帅”了。事在人为，人是工作的生动的力量。有什么事情不要靠人去做？人的腦袋里有沒有共产主义觉悟，有多少政治認識，有什么思想因素，都不能不影响我們的工作。

上面提到的，新会的县城建設工作，和佛山的薯类制品經驗，两处都提到把党的方針、計劃和口号深入人心。这就是“政治挂帅”的具体表现。每一个革命工作者，不仅自己要懂得实际工作、具体业务的政治意义和思想內容，还必须經常把党的方針、政策、事业规划，工作計劃，行动口号，通过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使之“深入人心”。有些同

志并不这样做，而习惯于采用行政命令，甚至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主观主义的办法，最后不免脱离群众，工作遭到損失，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

二

我們任何工作，如果不依靠党的領導，都是不可想象的，是必定要犯錯誤的。而依靠党的領導，就必须根据党的方針、政策、路綫，在群众中积极进行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做到“深入人心”，我們的工作才能得到輝煌的成就。这不仅是在工作方法上的群众路綫問題，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方向問題。不依靠党的領導，不切实根据党的方針、政策、路綫积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必然会迷失方向，在政治上犯錯誤。查根究底，还是由于沒有“政治挂帅”。須知道，“政治挂帅”本質上是插紅旗，拔白旗——“兴无灭資”。什么是我們党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呢？出发点是“兴无灭資”，归結点还是“兴无灭資”。我們在一切工作上“政治挂帅”，就是挂这“兴无灭資”的帅。当我们进行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过程中，都会发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都存在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存在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斗争；此外，还有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我們放弃或忽略这个斗争呢？还是坚决进行这个斗争呢？这是有沒有“政治挂帅”和挂得好不好的主要区别，也是我們一切工作是否得到真正的成就，真正的胜利的主要区别。

“紅旗”杂志发刊詞中，明确地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内主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綫的斗争，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縛下面完全解放出来。”我們應該看到，中国人民已經掌握了政权，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在經濟上已經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生产力也获得了大解放了；惟独人們的思想意識还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和束縛。如

① 1958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② 1958年6月29日南方日报。

果我們不加強思想戰綫上的鬥爭，不在人民羣眾中經常進行黨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他們就不能擺脫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就不能提高社會主義覺悟，那末，要真正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所有制也是不可能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所揭露的大量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那里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那里就要吃反革命和右派分子的虧。“事實證明：在思想鬥爭中，對於一切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都必須隨時進行有力的反擊；只是單純的防禦，或者讓步，必然就要敗退。思想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必去占領，真空是不存在的。”^①這是寶貴的經驗之談，是從實踐中得來的深刻體會。

用“興無滅資”的思想、觀點去處理問題，作為工作上的指導思想，並且用“興無滅資”的精神去教育羣眾，固然是“政治掛帥”的最主要之點。可是，“政治掛帥”的全部意義尚不止於此。有些人以為只有在敵我矛盾、階級鬥爭的問題上才有“政治掛帥”問題，只要在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上認清了方向，提高政治警惕，也就完全解決了“政治掛帥”問題。這種見解還不能說是很全面的。應當看到，在現實鬥爭中，既存在着“興無滅資”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同時存在着社會主義建設上“多快好省”與“少慢差費”的兩條路綫的鬥爭，這兩者雖然是不同性質不同範疇的鬥爭，但也不是沒有聯系的。黨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並在最近三年中取得了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這樣一個馬鞍形發展的教訓，制定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這是關係到社會主義發展速度的問題，也是全國人民幸福前途和世界持久和平攸關的問題。積極地貫徹執行這條總路綫，把總路綫的紅旗插遍全國，使總路綫的燈塔照耀全國人民的一切工作，這也就是“政治掛帥”了。這條總路綫體現着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和集體意志，但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夠為所有幹部和羣眾完全接受的，有待我們進行許多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才能使這一思想（理論）掌握羣眾，變成物質力量。為了貫徹總路綫，同樣不能沒有思想上的鬥爭。事實上就出現了“反‘冒進’論”，“秋後算帳派”，和“過份緊張說”，此外，還有“厚古薄今”，“妄自菲薄”，諸如此類，形形色色的促退派或“迷信派”。你不跟他們鬥，他們也要跟你鬥。這雖然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先進思想與落后思想的鬥爭，是躍進與保守的鬥爭，却非鬥個清楚不可。這個鬥爭為了求得思想和行動的一

致，大家都來當促進派。正確掌握這個鬥爭，才算是政治掛好了帥。

我們不僅要“政治掛帥”，而且要掛得好。即如剛才所談到的，那些要走“少慢差費”的路綫的人，他們也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的，就是不贊成“多快好省”。我們必須堅決指出：他們要不是根本沒有“政治掛帥”，至少是沒有掛好帥，應該糾正過來。

“多快好省”與“少慢差費”兩條路綫的鬥爭，看來屬於工作方法上的分歧，實際上又是兩種思想，兩種態度，和兩種思想方法的對立。前者是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尊重羣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後者是在思想上被經驗主義、教條主義所束縛，被形而上學所俘虜，這些東西拖住他們的後腿，使他們躍進不起來，或者簡直不想躍進。在這裡，同樣存在着是否“政治掛帥”的問題。何以見得呢？由於思想方法上的錯誤，導致工作方法上和工作路綫上的錯誤，必然招致政治上的損失，很容易在政治上犯錯誤。上面提及過，“兩條道路”的鬥爭與“兩條路綫”的鬥爭雖然性質不同，可是，要是堅持錯誤的建設路綫，就不利於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有利於資本主義的復辟，所以說兩者不是沒有聯系的。又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本來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如果不採取正確的辦法加以處理，用處理內部矛盾的辦法來處理敵我矛盾，或者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來處理敵我矛盾，這就不僅是工作方法、思想工作的錯誤，同時是執行政策上的錯誤，成為政治上犯錯誤了。所以說，在工作方法上、思想方法上也存在着“政治掛帥”的問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堅決同主觀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的。毛主席早在1941年就教導我們“……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党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能抬頭，党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②這就是把思想方法問題正確地提高到党性原則的高度來分析，可見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① 1953年5月17日人民日報載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

②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澤東選集第3卷820頁。

問題上同樣存在着“政治掛帥”問題。（當然，在這裡不應誤解。不能把任何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一些偶然的微小的錯誤都歸結到政治原則上來。）

三

要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大破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資產階級的哲學。“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①我們對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要取得徹底勝利，就得連同資產階級的思想武裝一并繳械，就得在理論戰綫上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形而上學進行搏戰。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教育我們的幹部和群眾擺脫資產階級的思想、觀點和思維方法的影響。這就顯得我們的理論工作十分重要，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毛主席的著作十分重要。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黨的一切工作的理論基礎。全黨同志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到實際中去，徹底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東西，它們妨礙人們養成分析和總結經驗的能力，使人們分不清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因而容易在政治上犯錯誤。我們應當從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束縛下徹底解放出來，使我們的思想和工作獲得生動活潑的展發。我們應當尊重群眾的實踐，尊重群眾的革命性和創造性，這才是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②這就是從根本方面來解決我們在一切工作上“政治掛帥”的問題。只有不斷提高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在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個根本問題上下工夫，才有可能掌握整個工作的普遍規律，和各種具體工作的特殊規律，這就從思想上武裝了自己，使革命工作者本身首先實現“政治掛帥”。非常明白，工作上的“政治掛帥”是工作者本身“政治掛帥”的直接體現和必然結果。

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對於實現“政治掛帥”愈來愈顯出其重要意義。確實存在這樣一種情況：有些同志有一定的政治覺悟，處理工作上的問題也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可是在今天（特別在今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形勢的要求下，已經顯得自己的理論水平跟不上去了，理論學習在他們感到特別迫切。另一種情況是：有些同志對於業務不熟悉，自己感到有認真鑽研業務的必要了，於是一心想“專”，就有忽視政治理論學習的傾向。無論如何，理論工作有大大加強的必要。

然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和思想武裝，決不能依靠書本來獲得，而必須首先依靠實踐，依靠集體，依靠許多善於在實際工作中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同志的幫助。“我們应当向毛澤東同志和其他聯繫群眾的許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縣、鄉各級黨和群眾的大批領袖人物）學習，學習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時時刻刻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辯證法和唯物論的榜樣，學習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把嚴肅的原則精神，同生動的獨創精神相結合的榜樣，學習他們同億萬人民在一起，看到了正確方向，抓住了真理，就為真理而奮鬥，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樣。”③——人們平常談到什麼人可算“政治上成熟”，在這番話里可以得到答案。那些政治上成熟的各級黨和群眾的大批領袖人物，正是“政治掛帥”的好榜樣，正是列寧所指的：能把理論工作與實際工作融合為一個工作的無產階級的思想指導者。④讓我們認真學習他們在實際工作上和他們自身的思想意識上“政治掛帥”！

① “黑格爾德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0頁。

② 中共中央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

③ 同上

④ “什麼是‘人民之友’”，列寧全集第一卷275頁。

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李又华

矛盾是統一物的对立和斗争。馬克思主义哲学認為，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都是矛盾的統一。就是說，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他們既相对立和斗争着，又互相依附而統一着，并从而構成这一事物。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动力，沒有矛盾和斗争，就沒有事物的发展，也沒有社会的前进。这是事物本身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样存在着矛盾。認為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論”（无矛盾論）是錯誤的。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間的矛盾。”这就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是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一个贡献。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发生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年多来在我国进行了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整风运动中普遍地改进了国家工作，調整了在生产中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人們相互关系等等，这就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得到进一步的解决，因而出现了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新形势，又一次給我国社会带来了新的面貌。这一切有力地証明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論的伟大指导意义。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事情是这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們精神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們精神的解放，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大跃进；这种生产力的跃进，又繼續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进和人們思想的前进。人們在不断地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社会和改造人們自己”。这是对毛

澤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論一个最生动的說明。

我們知道，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到了1956年，我們大规模地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生产关系的革命就基本上完成了。普遍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优越的，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基本适合的起积极促进作用的，因而使我国的生产事业，在解放以后能够迅速地恢复和大踏步地前进。第一个五年計劃已經于1957年完成和超額完成了，我国的工业化已經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第二个五年計劃又在新的基础上迅速展开了。我国將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建設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鋼鉄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要很快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肯定能够做到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一一定的矛盾。今天我国出现的生产力大跃进，不仅是因为我国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是适应的，而且也还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間的矛盾得到进一步的解决。大家知道，我国社会主义經濟制度建立不久，还没有完全建成，还没有完全巩固，某些地方还不够完善。这些缺陷也就構成目前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間的矛盾。

那么，目前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在经济制度中存在着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所造成的矛盾，表现在那些方面呢？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

我們知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今天只是基本上完成，还不是全部完成。比如还剩下的一小部分小农经济还没有合作化，这些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对于生产力仍然是不相适应的，今后还要继续改造。其次，一部分工商业是公私合营的，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小部分合作社（指初级社），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些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如公私合营的企业，资本家还拿高薪还保留着剥削，即每年要支付给资本家一笔“定息”；初级农业社还要支付社员的土地、林木和耕畜的报酬，使富裕中农得到较多的收入。这些从总的来说，在今天虽不会严重妨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然而对于那些社会主义生产的积累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免要受一些影响。因此，还必须在适当时候逐步加以解决。就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有的也还不够完善。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还存在着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指个人经营部分）之间较突出的矛盾，即有些合作社的农民，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过大，甚或超过合作社分配得来的收入。很明显，这对于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是不利的，因而必然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今后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壮大集体经济，缩小个体经营的部分，逐步做到社员从合作社劳动得到的收入占其家庭总收入比重的绝大部分（譬如说占70%—80%）。又如手工业合作社，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一部分宜于集中生产的手工业社，有必要逐步转为合作工厂（合作工厂是大集体所有制），才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和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这是手工业社发展的方向，今后必须逐步求得解决。我们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现在全国人民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舞下，正在各地大批地建立各种类型的工厂。不仅是县县办工业，而且乡乡社社都可以办工业。这是当前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总之，今后我们需要继续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使更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目前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表现在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方面。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存在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是一般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也反映了这种阶级对

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这种敌对关系已经消灭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开始按互助合作的原则建立起来了，它积极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不久，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管理人员与直接生产者之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某些不协调。主要因为在生产单位中，有不少的工作人员还存在着旧社会带来的官气和旧社会的作风，没有完全按照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对待群众，因而脱离了群众，或者完全脱离了生产。这就必然影响劳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这次整风，许多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开始转变作风，做到深入车间，跟班劳动，种“试验田”，直接参加生产，做到深入群众，真正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这就大大改善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真正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发展起来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激发起来了，生产力也就进一步解放了。这种互助合作的相互关系，今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必须继续加强。其次在各种生产单位中，还存在着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工作的缺点，使得机构臃肿和浪费劳动力。为适应生产力大跃进的要求必须进一步精简管理机构，下放劳动力和加强劳动组织。第三，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生产中的协作关系，还需要继续改进和加强。例如我国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不同的形式，他们之间的关系，大体上也就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好的，是互相协调的。这是促进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保证。但随着经济的高涨必然出现新的问题，促使相互关系需要继续调整 and 加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推动了工业的大发展以致整个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也必要跟着大发展，在工农业的关系上，就有必要使国营工业企业如何更有力地帮助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同时合作社也要更好地支援国家工业。又如生产的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厂矿之间，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大、中、小厂之间，如何在生产中“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协作关系。今后还必须继续加强协作，克服本位主义旧思想，充分发挥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这次全民整风运动，改进和调整人们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只有认真改进和调整相互关系，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更好的发挥出来，就能保证生产力大跃进，保证技术革命的顺利开展。

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还表现在分配問題上。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分配适当与否对生产力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会长期存在着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建設、人民生活改善不断增長的需要与每个时期社会生产所实际达到的水平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須搞好分配。分配問題包括积累和消費的分配。

第一，积累和消費之間的分配。我国整个国民收入，應該多少用以积累，多少用以消費，这是一个重大的分配問題。积累和消費之間分配的缺点，必然引起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随着生产的增長，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額，逐漸有所增加，这是必要的。我国过去国民收入的分配，基本上是正确的，它保證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建設高速地进行和人民生活逐渐改善。但也曾經出现过某些錯誤。比如由于在1956年多招了一部分新职工，对于某些人員的工資增加得多了，曾一度引起市场供应的某些紧张，本来經過增产節約运动，問題就很快解决了。可是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对待这些缺点，在1957年提出“反冒进”，其結果是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設，特别是影响到农业的进展。这一錯誤，已很快得到了糾正。

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积累和消費的分配怎样才适当呢？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曾规定：合作社留公积金，一般的不超过合作社收入（除了向国家納稅和扣除生产消耗以后的收入）的8%，經營經濟作物的合作社可以达到12%。过去按这个原則进行积累和消費的分配，基本上是适当的。保證了合作社經濟有所发展和大多数社員收入的增加。1957年由于生产量的增長，不少合作社的积累比重已經突破此数，这也是必要的。相反，某些合作社強調了社員收入的提高，积累分配少了，因而影响了合作社經濟应有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关于积累和消費的分配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工作报告中这样指出：“在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条件下，無論国营經濟和集体經濟，都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便更多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这无疑在今后調整国民收入积累和消費的分配关系的正确原則。

第二，积累本身的分配。調整积累本身的分配关系，必須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为依据。中国共产党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正确地提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

在集中領導、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因此在生产性积累基金的分配中，除了保證优先发展重工业外，又要充分照顧到发展农业和輕工业；同时注意到建設大型企业和建設中小型企业并举；建設中小型工业又必須充分发挥各級地方的积极性。这样就能加速建設基金的流轉，多快地发展生产力。党中央指出，过去对地方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是一个缺点。这次整风和生产大跃进，大力克服这个缺点，情况开始大大改变。总之，积累本身的正确分配，將加速我国工业化，促进我国工业建設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并促进全国农业发展綱要40条提前实现。

第三，消費的分配，即有关人民生活的分配。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不但在建設和生产方面表现出它的优越性，而且在消費方面也表现它的优越性。大家知道，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逐步提高，今后还要繼續提高。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即在各尽所能、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貫徹按劳取酬的合理分配。在各类劳动人民中，如何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是关系到各类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相互关系的重大問題，处理得好不好，將直接和間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現定的工資制度，基本上是适当的，但是还不够完善。在工資等級制度、計件工資制度、学徒制度、津貼制度、獎勵制度方面，在劳动保險、公費医疗、福利費等等福利待遇的规定方面，都还有不够切实和不够合理的地方，需要我們繼續加以改进。由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同时城市生活条件高于乡村，因此目前职工的工資一般的高于农民的劳动报酬，也是基本适当的。当然，如果相差过大，就会影响到工农群众的相互关系，那就是不妥当的。今后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民的个人收入將有較大的增長，这种矛盾將会得到更好地解决。现在知識分子的收入，一般的比工农劳动者的收入为高，但这种距离比起旧社会已經小得多了，因此也是基本合理的。国家給高級知識分子以較高的待遇，目的是照顧他們的工作性質，并鼓勵他們發揮所長，多多貢獻給社会主义建設，这也是必要的。但如果知識分子要求过分特殊，計較待遇，玩忽工作，甚至是反对人民，那就会引起很大的矛盾。关于劳动群众中消費的分配，党中央向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工农生活水平，城乡生活水平之

間，在不同工種、不同技術等級、不同地區的工資之間，一定的合理的差別是必要的，但是應當避免不合理的過大的距離。縣和縣以下的企業，對於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的問題，應當作出適合農村和半農村環境的規定，而不要搬用大城市大企業中現在實行的那一套辦法。”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

消費分配中的矛盾，有的確是由于分配不當而引起的。這種矛盾屬於生產關係（分配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而必須調整分配關係。但也有這樣的情況：分配本來是恰當的，而人們中仍然有一些人不滿意，這是由于人們舊的思想意識作怪。這就要改造他們舊的思想意識，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教育，才能取得解決。

以上簡要地說明了目前我國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既相適應又相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情況。我國正在掀起一個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又將使生產力躍進到新的階段。隨着生產力的躍進，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必然又要出現一系列新的矛盾。但這些新的矛盾都是在我國生產關係基本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產生的，只要我們及時調整和改進生產關係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就能取得解決，無需改變根本的制度。由於矛盾的不斷解決，就將推動着我國社會生產力更快地前進。

二

馬克思主義認為，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一定階段相應的生產關係，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經濟基礎相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意識形態等，構成社會的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為它的經濟基礎服務並通過經濟基礎的中介為生產力發展服務，也就是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我國現在建立起來的新的上層建築，基本上是適合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因此它促進着我國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同時也就推動着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八年多來我國生產的空前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毛主席說：“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引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因此，我們的政治制度和國家越鞏固和越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教育、藝術、道德等精神生活越繁榮和越豐富，它對我國社

會主義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發展，就越起促進的作用。毫無疑問，來自黨和國家的正確的路綫、方針、政策、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政治是統帥，其意義也就在於此。最近黨中央正式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這條正確的總路綫，將對我國今後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的发展，發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仍然存在着矛盾，這種矛盾表現為上層建築中某些環節上的缺陷。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是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聯系在一起的，是我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另一方面。那麼，目前我國社會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主要存在於那些方面呢？

首先，在上層建築中還存在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

我們知道，我國仍處在一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現在資產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他們還有剝削。大部分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觀點，還未改造過來。一切舊時代剝削階級留下來的影響，還未完全肅清。因此我們還存在着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列寧說：“過渡時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社會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引自“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與政治”）所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即“興無滅資”的鬥爭，是我國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所謂主要矛盾，它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在過渡時期中所表現的一種尖銳的突出的鬥爭。但是，當生產資料所有制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後，這個主要矛盾也就在生產關係方面基本解決了。這時候，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就着重轉到上層建築方面（政治上思想上）來了。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泛濫，對於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發展生產力，成為一個尖銳的矛盾。大家知道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是我國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決定意義的鬥爭。這個鬥爭經過一年多來的努力，已經取得基本勝利。但是在思想戰綫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並未結束，而且將是一個長期的鬥爭任務。毛主席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

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引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應該了解，肅清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影响，不能不是一个長期的过程。改造資產階級及一切剝削階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是一个長期的艰巨的任务。在农村中，从私有到公有，从个体到集体，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重要的問題在于教育农民，使广大农民脱离資本主义道路和私有制度的影响，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化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一个長时间的教育任务。因此两个階級、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今后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同时它将是上层建筑与經濟基础的矛盾的主要内容。而且这种斗争將是一起一伏的。

其次，目前我国社会上层建筑与經濟基础的矛盾，表现在我們国家机构中存在着工作作风方面的缺点。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的指导和领导力量。我們的国家机构，是为人民服务的，是适应社会主义經濟制度和生产力发展的。党和国家领导着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从胜利走上胜利。我們国家的各种机构，执行着組織、管理、計劃、发展国民經济的领导职能；它发展着我国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它調整着人民內部的关系，对敌人則实行專政；它保卫着国土免受外来的侵犯。毫无疑问，我們国家的各种机构，对于我国經濟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是有极其重大的作用的，八年多来經濟建設的成就已經表现了它的丰功伟績。同时我們国家的各級领导机关、人民团体、学校等的工作干部，絕大多数都是好的，因此他們在广大劳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广大群众給予极大的信任。但在我們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員中也还存在着作风方面的缺点。中国共产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样指出：“几年来在我們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新的滋長”。因而发动了全党整风运动。这个整风运动接着在各級政府、人民团体、学校、軍队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干部中，也大规模的展开了。在整风运动中开展了最广泛的批評与自我批評，以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克服官气、暮气、闊气、驕气和娇气；克服建設事业中一切浪費现象和保守现象；并且对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腐朽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經過整风运动，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逐渐建立起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

“在国家生活的广大范围内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在日益发展起来”。（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工作报告”）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和生产力发展，造成极其有利的形势。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硬說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階級專政的产物，說主观主义是馬列主义的产物，整风运动的事实証明恰恰相反，只有无产階級專政，才能橫扫“三风”和“五气”，逐渐消除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惡习，只有馬列主义思想才能克服主观主义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將是一个長期的斗争，今后还必须繼續貫徹。为了消灭官僚主义和克服主观主义，必須加强无产階級專政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

再其次，由于我們国家制度中存在着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也造成上层建筑与經濟基础之間的矛盾。比如我們国家各部門所制定的許多规章制度，大部分是适当的起积极作用的，对于生产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有不少是不合理的或过时了的。这些不切实际的部分，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对生产是不利的。这次整风，提出打破陈规，进行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改革，这是非常必要的。国家的规章制度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改善了规章制度，就消除了我們国家制度中的这些缺点，使新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为經濟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服务。又如这次中央对于管理体制，作了重大的改变，將許多领导国民經济及其他文化教育方面的中央职权下放給地方，使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更好地結合起来，讓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种管理体制的重大改变，必然使这些上层建筑更接近經濟基础，更加适应大发展形势下的經濟基础和生产力。

我們知道，人們的思想常常是落后于实际的，这也会引起上层建筑与經濟基础的矛盾。人們思想落后于实际，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而人們的正确思想，是客观现实发展规律的反映。特别是当前生产大跃进的时候，客观现实变化得那样快，使許多人的思想跟不上去，因而成为右傾保守。現在問題集中到是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呢，还是消极松劲、甘居下游、少慢差費地建設社会主义呢？这是两种路綫和两种方法的斗争，我們必須反掉后一种，以克服右傾保守。

我們知道，广大劳动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新制

度的，但对于新的社会制度，又还不是人人都很习惯。我们絕大多数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但对于具体政策的掌握和日常工作的經驗，又还不够丰富。这些思想落后于实际，工作赶不上要求的现象，都会产生上层建筑与經濟基础之間某些不够适应的矛盾。必須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和又紅又專的道路，来逐步取得解决。

以上簡要地說明了我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基本适合經濟基础而又存在着矛盾的状况。通过矛盾的不断解决，就使上层建筑更能适应和促进經濟基础的巩固与发展。

三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去認識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以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向自然界开战。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人民与人民互助合作的关系，敌对状态的关系已經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消灭了。那么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間的矛盾，显然不是属于敌我矛盾，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对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一般的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因为代表它的，如單干农民和手工业者、资产階級分子是属于人民的一部分。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不能混同于敌我矛盾。其次，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属于人民的。比如我們国家机关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教

育、科学、艺术等等是造福于人民的。因此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經濟基础之間的矛盾，显然也不表现为敌我矛盾，而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階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大量地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极少数的资产階級右派分子，因为他们要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矛盾才是敌我矛盾，我們必須坚决的打垮他們。同时社会上还有其他极少数的敌对分子，如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坏分子和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中的反动分子等。这些人也是和全国人民作对，要想死灰复燃的。我們和他們之間也是敌我矛盾。我們必須扫除这些渣滓。敌我矛盾虽然是少数的，但我們要經常提高警惕。在我們国家里，人民内部矛盾却是大量存在的，我們必須按照着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按照“团结——批評——团结”的公式去求得解决，以便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建設我們伟大的祖国。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使我們在建設社会主义中更能正視现实中的矛盾，从而能更勇敢与积极地設法去克服困难，推动工作的前进；使我們更深刻地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凡是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老制度和陈腐观念，都要死亡；凡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和思想，都要发出生命的威力。这就使我們坚决起来，繼續进行經濟战綫、政治战綫、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到处插上紅旗，以便彻底解放生产力，迅速提高生产力，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58年6月

中山大学开展教学改革运动

中山大学以紅專問題为中心的思想革命运动，宣告胜利结束后，随即于六月下旬展开教学改革运动。

在前一阶段大鳴大放中，揭发了該校有些行政领导干部及不少教师过去对待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在指导思想和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资产階級倾向。为此，該校决定在思想改造胜利的基础上，繼續进行思想革命，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改革运动，通过大鳴大放和大爭大辯，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展开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以达到贯彻总路綫的精神和

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

六月十九日，該校举行扩大会議，討論通过了教学改革运动的計劃。六月二十二日，該校领导干部向全体教工和学生作动员报告，要求大家認識这次运动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繼續思想革命，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改革运动，发挥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为建設共产主义的中山大学而奋斗。报告最后希望在教学改革运动中人人自觉革命，人人插紅旗。

預計該校的这一运动从六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止，为期共达两个月。

南共修正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

楊群史汀

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同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是最近国际政治問題的一件大事。这是馬克思主义和反馬克思主义的两条路綫的斗争，是新兴的社会阶级力量同垂死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尖銳的斗争、帝国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銳的斗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反映；这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繼續胜利发展的一场大是大非之爭。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仅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是对于团結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民族奴役、反对战争的人們，共同爭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更大胜利，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影响。

去年十一月間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与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得到全世界馬克思主义政党和进步力量的拥护和欢迎。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決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宣言，总結了一百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闡明了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必須遵守的共同原則，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团結广大人民群众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根本方針，奠定了各国共产党团結的思想政治基础，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綱領性的文件。”大家知道，南共的代表沒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他們不仅公开表示反对这个宣言，而且在今年四月举行的他們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反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綱

領，来同莫斯科會議的宣言相对抗。

南共綱領是现代修正主义最系統最集中的表現。它在一系列的根本問題上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他們用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論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們否定工人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领导作用；他們丑化无产阶级專政和社会主义陣营，美化资产阶级專政和帝国主义陣营，特别是对全世界人民的第一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感恩戴德。在方法論上，他們和一切机会主义一样，用无耻的詭辯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因此，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以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是每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責任。以南共綱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死敌，我們必須和它作坚决的斗争，直至他們在政治上、理論上完全破产。

按照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取得国家政权。只有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專政，并利用这个工具，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所以，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国家政权問題上，在无产阶级專政問題上，是絕對不能动摇的。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專政的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規律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經驗中所得出来的科学結論。它闡明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同时闡明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經过程和規律。馬克思恩格斯这种科学結論構成了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是馬克思主义的主要点。

大家知道，任何統治階級都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任何資產階級的政權從來就是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堅決反對者；因此，不能指望依賴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里的資產階級政權去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無產階級為要推脫奴隸地位，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就必須運用適當的形式和選擇適當的時機，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這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的問題了。

可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者卻提出了與上述觀點完全相違背的反動的超階級的國家論。他們宣揚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謬論，否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我們且來看看他們的一些反動論點：

首先，他們掩蓋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階級性質，企圖腐蝕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意志。國家是什麼？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而南共綱領草案卻說什麼資本主義世界中“國家日益監督資本”、“限制資本”、“國家調節者的作用得到加強”，把資產階級國家描寫成和資產階級利益相對立的东西，這不是天大的謊話？資產階級國家所“監督”的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它決不會去“限制”資本的發展；如果說資產階級的國家有什麼“調節者的作用”，也只是企圖緩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性社會矛盾，以利于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但資產階級國家之為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機關，這一本質始終是不變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還認為，“壟斷資本巨頭同國家管理聯繫起來的過程仍在繼續。壟斷資本巨頭在他們掌管的某些部門中日益喪失其原有的完全獨立的作用，而壟斷資本的某些職能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轉交給國家。”“由私人資本轉交給國家的某些職能愈多（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採取不同方式限制私人資本的權力），經濟中的新的、從其客觀趨勢來說就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壓力就愈大。”這不是天大的鬼話嗎！所謂壟斷資本，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也是資本主義的最反動的形式。壟斷資本巨頭不但掌握着資本主義國家整個國民經濟的命脈；而且實際上掌握着國家的政治權力，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太上皇。說什麼“壟斷資本的某些職能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轉交給國家”，只不過是純粹的謊辯，國家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服從於壟斷資本的利益倒是確鑿的事實。美國金融巨頭就是白宮的

真正主人，這不是可從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所奉行的政策中得到証實的嗎？

其次，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為了進一步販賣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論點，他們還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形式之一的國家資本主義大加歌頌，他們說：“國家資本主義關係的特殊形式可以是資本主義保全自己的最後努力，也可以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也可以同時既是前者也是後者”；“客觀的發展過程使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前提和因素得到加強和發展，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客觀上日漸靠近社會主義”。這樣，他們居然變戲法似的得出如下的結論：“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已經成為過去”，“社會主義思想不再是主要圍繞着摧毀舊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轉圈子了”。我們知道，列寧在“論糧食稅”和其他有關的著作中，確實曾經強調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列寧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執政以後對資產階級採取贖買政策（如果可能的話）的一種形式，列寧甚至也曾說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滿的物質準備，是進到社會主義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的這樣的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稱為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但是，這裡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這就是無產階級取得革命的勝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例如我國過渡時期存在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既具有社會主義因素，又具有資本主義因素的過渡性質的經濟成分，而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在其中又居于領導地位。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在可能的條件下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形式，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因素，使社會主義經濟占統治的地位。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里的國家資本主義，只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對經濟事業的直接管理，是壟斷資本的一種形式。列寧就曾指出：“資本主義國家里面，國家資本主義是表示，它為國家所承認，並受國家監督，以維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①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有意割裂政權和國家性質這一基本前提，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居然說實現社會主義不必再“主要圍繞着摧毀舊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轉圈子”，這不是最露骨地為保護資本主義舊制度而拙劣地欺騙群眾嗎？這

① 列寧：俄國共產黨（布）底策略，列寧文集第七冊，200頁。

不正是老牌修正主义者“资本主义和平長入社会主义”調調的翻版嗎？

按照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上述两个論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階級的任务就必然不是用革命的方法夺取国家的政权，用革命手段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專政的国家机器，而是只要对资产阶级的政权“不断施加压力”，争取在这种政权中“起决定性的影响”，据说这样就可以“保證社会主义的发展”。南共领导集团在这里所散播的改良主义，跟英国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反动論点毫无二致，其目的无非是欺騙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对他們散布投降主义，腐蝕他們的階級斗争意志罢了。

請看吧！事实正是这样：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不仅引誘工人階級向资产阶级投降；另一方面，还极力美化资本主义，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的社会化、資本和生产的集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国有化运动”，甚至连资产阶级政府被迫采取的一些社会福利措施，都统统被南共归入“社会主义”的范畴。按照南共的詭辯的邏輯，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簡直就是同义語。

必須指出的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又极力丑化社会主义。他們学着一切反动派的共同口吻，說什么无产阶级專政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极权主义”，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經濟，硬說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經濟”，丑詆为“旧社会关系的最后反映”。我們从这里可以看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說成是“社会主义因素”而加讚拜謳歌；另一方面，却又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經濟說成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加以嘲笑詛咒。同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名詞，原来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有此妙用！或爱之，或惡之，无非是从自己的階級利益出发。这真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幅絕妙写照！

那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到底又是怎么一种东西呢？按照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說法，“社会主义”經濟有两种所有制，即所謂“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他們所說的“集体所有制”，就是南共所宣扬的讓直接生产者“自行决定有关产品的生产和总分配問題”的“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还有权决定修改工厂的价格政策，对工厂負有盈亏的最后責任，如果工厂的生产完成得好，能获有盈利，工人們就可

能得到獎金；但是如果工厂亏了本，工人們就得扣除工資以进行补偿。依照一个美国記者的看法，这种“工人委员会”当“談到‘他們的’工厂时，就象一家公司和股东一样”。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認為，“私有土地生产”也是大型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一个組成部分”，小私有者也是“社会主义經濟力量的一个組成部分”。所以，“个人所有制”即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就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經濟的两种所有制形式之一。这就难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提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使人的个人幸福服从任何最高目的”，也就是說，个人利益應該放在集体利益之上。这也难怪南斯拉夫今日的农村个体农民所有制占77.4%，合作社所有制占3.4%，国家所有制只占19.2%，大約30%的可耕地是由个体农民耕种，农村中占14%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占有耕地的44%，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雇工。南斯拉夫的所謂“社会主义”原来是这么一种东西，这也就难怪上面所說到的那位美国記者亲切地称呼南斯拉夫为“小美国”了。

南共綱領草案还提出了“国家消亡論”。在当代世界分成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陣营，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顛复活动的情况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竟把消亡国家作为现实任务，这只是他破坏社会主义陣营各国，詆毀无产阶级專政的一种手段而已。只要指出下面两点就够了：为什么南共领导集团就不但不提出要资产阶级的国家消亡，反而无耻地美化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呢？其次，为什么鉄托集团今天掌握着南斯拉夫的政权，对正直的共产党人橫加逮捕放逐呢？修正主义者不是不知道掌握政权是階級斗争的最高目的这一点，而只是十分反对无产阶级和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牢固地掌握政权罢了。因此，如果說南共綱領提出的超階級的国家論是为了美化资产阶级專政，从而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南共綱領提出的国家消亡論，则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專政，企图为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复辟扫清道路。

三

其次，我們从关于党的学說問題上揭露和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

无产阶级要从事解放本階級和解放全人类的斗

① 1958年5月17日，美国“星期六晚郵报”：“我們对南斯拉夫的賭注是否上算？”

爭，就必須組織本階級的政黨，這個政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只有在這個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進行革命鬥爭並在革命勝利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才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所證明了的。可是，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卻宣揚一套取消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作用的反動論調。南共綱領草案說：“認為共產主義政黨可以壟斷社會主義運動的每種形式，並認為社會主義只有在這些黨里也只有通過這些黨才能體現出來的觀念，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實踐中也是十分有害的”。這種口吻，和以“社會主義”相標榜而實際上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敵人的英國工黨和社會民主黨右翼先生們的反共謊言又有什麼區別呢？為什麼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一方面以“共產主義”政黨自居，一方面又對共產主義政黨“壟斷社會主義運動”表現得這樣反感呢？事實上，社會主義運動不指望共產主義政黨去“壟斷”，難道還能希望資產階級政黨也來參預嗎？南共綱領對共產主義政黨的攻擊是全面的，一方面，他們詆毀今天尚未取得政權而領導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對本國資產階級展開英勇鬥爭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在本國不再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革命性、創造性的推動因素”。他們還特別投美帝國主義之所好，污蔑美國共產黨說，“在實際上不存在什麼典型工人階級政黨的國家里，譬如美國，最大的可能就是把工人階級組織在工會里，首先通過工會日益把他們卷入自覺的社會主義力量成長的過程，卷入工人階級為加強其社會影響和爭取在政權體系中的領導作用的鬥爭中去”，在這裡公開散布工團主義思想，要美國工人階級離開自己的階級先鋒隊。另一方面，南共領導集團對已經掌握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也極盡其污蔑丑化之能事。他們認為，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作用只能是“思想因素”，而不能是“政治因素”和“政權因素”。他們在反對“黨政不分”的借口下，反對黨對國家的直接領導和監督，他們說“黨和國家緊密結合”就必然使黨“官僚主義化”和“極權主義化”。我們知道，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不僅建設的總路線總政策、或者國家的一般的政策方針，需要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結合本國的具體實際來加以制訂；就是在這些路線、政策、方針制定以後，也還需要黨進行一系列的宣傳、組織、動員、監督的工作，來保證其貫徹執行。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勝利的根本保證。實際上，在

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和產物的國家里，領導總是客觀的存在，不是你來領導就是我來領導，不是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來領導國家，就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領導國家。所謂“黨政不分”、“極權主義化”等等，只是南共領導集團苦心孤詣丑化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無中生有的歪曲和污蔑罷了。

民主集中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南共修正主義者也在這個問題上加以惡毒的攻擊。我們知道，民主和集中是矛盾的統一，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如果把民主和集中分割開來、對立起來，則民主將成為沒有領導的極端的民主，集中將成為獨裁式的絕對的集中，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南共修正主義者就是這樣把民主和集中絕對化起來、相對立起來。他們在“發揚民主”的借口下，大肆攻擊社會主義的集中，竟說：“行政集中領導是過渡時期、歸根結蒂也就是社會主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他們認為，集中制是一切禍害的根源，認為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社會主義國家“阻礙民主的發展”、是產生“官僚極權主義”的根源。在這裡，南共修正主義者的口吻也是和資產階級的論客一模一樣的。

四

用反動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代替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是南共修正主義者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又一個方面。

什麼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呢？列寧對此作過明確的表述：“真正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這就是竭誠工作來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鬥爭，毫不除外地幫助（以宣傳、同情和物質來幫助）所有各國中同樣的鬥爭，同樣的路綫，而且只幫助這種鬥爭和這種路綫。”由此可以看到，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同的奮鬥目標——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上面的。列寧還指出，“無產階級以及全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全體勞動群眾如果不是自願地力求結成聯盟和團結一致，那麼，戰勝資本主義這個事業就不能順利地完成。”社會主義各國和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的實踐，證明了列寧這種論斷的完全正確。

但是，南共綱領卻提出了與這些觀點完全相反的論點。他們把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馬

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一致，结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说成是某一大党的“思想霸权”和“政治霸权”。他们强调“国际主义只能以实现各族政治和经济上的完全平等的愿望为基础”，这就是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只看作是普通的国与国之间必须遵守的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自然，平等和不干涉内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原则之一，但是这远不能概括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和更主要的还包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一致、互相援助和牢不可破的友谊。只承认前者而否认后者，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和国际团结的必要，这除了削弱社会主义的国际力量，大大有利于帝国主义力量以外，又有什么别的作用呢？南共修正主义者在理论上否定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实践上也就表现出一系列的反动行为：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美化帝国主义阵营，特别是对世界和平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感恩戴德。

南共领导集团一向强调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民族特点”，否认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实际上也就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都不忽视民族特点和一国的具体情况，而且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这些共同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中有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不允许机械地抄袭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因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但是，南共修正主义者强调“民族特点”，却到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的地步，他们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全都否定或任意割裂了。关于南共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就是美国记者也意识到了。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那篇文章就说：“南斯拉夫的领袖们增加了他们对于辩证法的厌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过，‘你就是不能根据教科书来测量活的形势’，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要引用马克思和列宁来为他们做的事情辩护。”①南斯拉夫今天尽管还挂着“共产主义政党”、“社会主义”之类的招牌，但是贩卖的却是美国资本家和他们所豢养的新闻记者所十分感兴趣的東西。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南斯拉

夫修正主义者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力量和全世界进步人类有什么共同的敌人，他们对美帝国主义雪中送炭，认敌为友，不要说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共同的語言，就是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人们，也是心有二致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历史上一切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一样，与反动派一起成为历史的反动力量。

五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而他们却忝不知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而且说成仿佛正是他们在“创造性地”、“建设性地”“发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是在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贡献”呢。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对于南斯拉夫领导人，不过象“民主”、“自由”之类的字眼之对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流那样，作为自己与这些概念极端相反的行为的掩饰物罢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实质上是彻头彻尾地反马克思主义的，象一切工人阶级的叛徒一样，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居然在自己的党的纲领中写着，“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思想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了”、“在最近十年间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事变的发展与物质条件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却学着反动派的口吻来诋毁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这一切说法除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仇视、破坏马克思主义的謠言和污蔑以外，难道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吗？事实自然不是象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事实是，正如莫斯科会议宣言所指出的，“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现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九亿五千多万人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三千万以上的共产党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际威望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作用都大大增长，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表现得生气勃勃，在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出无比巨大的威力。但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看不到这些铁的事实，根本否定这些铁的事

① 见前注：“我们在南斯拉夫的赌注是否上算？”

实，而大叫馬克思主义“停滯了”、“落后了”、“过时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这决不是什么馬克思主义“过时了”、“停滯了”之类的問題，而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根本否定馬克思主义，否定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存在的問題。南共领导集团在这次南共“七大”中強調說：“我們不承認誰有权判断这个綱領中哪些是馬克思主义的，哪些是非馬克思主义的”。这的确是蛮不講理的无賴口吻！是不是馬克思主义，这不是随便什么人有权加以判断的問題，现实生活的实践是一切真理的檢驗者。如果連美国垄断資本家也引为“同伙”，認為“鉄托的利益在將來很長时期內与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的“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貨色，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南共领导集团自己“有权判断”，但是人民群众和历史却是欺騙不了的。鉄托集团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的基本原则，一概斥之为“教条主义”，而他們則自称为“教条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这句话从这样的實質上来加以理解倒是完全正确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确实是彻头彻尾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

鉄托集团在观点和立场上是彻头彻尾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思想方法上則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詭辯来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这种詭辯的主要方法是：首先，他們混淆了馬克思主义和馬克思主义者的大是大非的立场，从而在事先主观假設的荒謬的前提下信口雌黃。例如，他們根本否定世界两大陣营的客观存在，否認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垄断資本集团是战争的根源、对和平事业和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而拿所謂“軍事政治集团的存在”来说明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甚至不惜顛倒是非，歪曲历史事实，把美帝国主义組織北太平洋公約的侵略集团的先发的行动，說成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抗北太平洋公約侵略集团政策而組織自卫性的“华沙条約联盟”的結果。这种弥天大謊，也并不是什么新鮮东西，而是从杜勒斯之流的“錦囊”中販运过来的反苏反共貨色罢了。又如前述关于“国家資本主义”概念的詭辯，也是在否定階級專政和国家性質的根本前提下进行的。他們对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作用的污蔑，根源于他們的“資本主义自发地和平地長入社会主义”的荒謬前提；他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滋長着国家极权的官僚主义”之类的污蔑，則根源于他們否定无产階級專政的必要、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荒謬前提，如此等等。由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一系列

根本問題上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原則，因此他們不仅往往陷于邏輯上的混乱，而且就是在最簡單的属于形式邏輯范畴內的問題，也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正是由于这样，由于掩盖他們思想上理論上的混乱，因此，第二：他們的詭辯往往借助于稀奇古怪的名詞、含糊的概念和混乱的叙述。他們使用着一大堆什么“人性”、“人的个性”、“作为社会生物的人的真理”、“人的精神結構”、“国家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修正主义”等等反动噱語，在叙述問題时故意別別扭扭，表现出惊人的邏輯的混乱。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而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从一切老牌修正主义者那里取来的“法宝”。列宁在駁斥社会沙文主义者时就曾指出，这些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計地掩饰自己言論里的簡單明了的思想，故意把它弄得糊里糊涂。”^①他們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更易于欺騙劳动人民罢了。他們为了替自己的反动面目掩饰、辯护，还表现出极端的强硬和頑固。鉄托集团至今拒絕各国馬克思主义政党的批評，对待这些批評除了加以污蔑和歪曲以外，絲毫作不出任何認真的討論，另一方面，他們又一再扬言，“……如果任何方面有人期待我們放弃我們在國際問題和內部問題上的原則性的立场的話，这只是浪費時間”。他們在維護自己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確表现出十分“英勇”。借用列宁所說过的一句話：“口头上是勇士，而实际上是叛徒。这真是說得千真万确啊！”^②

或許有人会說，既然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彻头彻尾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极端仇視社会主义事业的，那么，为什么他們还口口声声自称“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而不干脆剥掉自己的“馬克思主义”的画皮呢？这想法未免显得天真。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现代国际范围的階級斗争的产物，是现代帝国主义者——首先是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政策的产物。列宁早就曾指出：“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資产階級和工人階級中間受帝国主义額外利潤收买而变成資本主义看門狗和工人运动破坏者的那些階层。”这的确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恰切写照！这些年来，美帝国主义給予了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小的国家以27亿美元以上的“美援”，几乎

①列宁：“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詭辯”，見“学习譯丛”，1958年6月号，第一頁。

②見注一，第二頁。

等于蒋介石集团从中国大陆溃退前夜所获得的“美援”(60亿美元)的一半!今年南斯拉夫消费的每一块面包中有十分之七的面粉是来自美国。如果不是南斯拉夫挂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铁托集团挂着“共产主义”的招牌,他们的身价就决不能这样高的。既然有这两块招牌,那么,按照美帝国主义自己的说法:“我们在南斯拉夫所投的赌注是上算的。”美帝国主义自问自答地说:“这是一次利害的结合吗?当然是的。但是,看来是,铁托的利益在将来很长时期内与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只要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就是那个目的在于破坏克里姆林对东欧的控制的唯一的从内部进行的工作中的伙伴。”①有人怀疑,为什么要公开揭露和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列宁早就教导过我们:“对无产阶级来说,公开的叛徒倒比暗藏的叛徒好一些。”修正主义者如果还有一点本钱或作用的话,那就是他们身上有一块“马克思主义者”的画

皮,我们彻底剥开他们这张画皮,在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进步人类面前拆穿他们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的真面目,对国际工人阶级的事业、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的事业都会大有好处。有人怕公开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会把南斯拉夫推到帝国主义哪一边。而实际上他们本来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哪一边,我们的公开揭露和批判只是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罢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以南共纲领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和过去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会通过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而更加发扬和取得更伟大的胜利,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则一定会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一样,临到可耻的下场。

① 见1953年5月18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我们对南斯拉夫的赌注是否上算?”



有关“广东护国军”的一件史料

最近笔者发现1916年(民国五年)广东护国军的任命状乙纸。全文是这样的:

任命状 令字第拾叁号

任命梁振勛为广东护国军林军第三梯团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五连一排长此状

右给排长梁振勛准此

陈自光(印)

中华民国五年五月一日(广东护国军林军第二梯团司令部之印)

据笔者所知,关于“护国”运动中广东方面的斗争情况,一般史书记载不多,据知,1915年12月15日云南“护国军”起义,分三路出军,其中李烈

鈞经滇南攻广州。1916年4月6日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这是一个假独立,他事先得到袁世凯“独立拥护中央”的指示才决定的,广东人因久受龙济光压迫,尤其不予信任,一致主张驱逐龙济光。(参阅来新夏:北洋军伐史略;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没有提及有“广东护国军”组织之称,但这一文件使我们有可能确定:当时在广东有“广东护国军”的组织,而事实真相如何有赖于近代史专家的考证。

注:该任命状现存我处。

化县第四中学 刘宁溪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跃进的關鍵

孙 孺

科学工作必須为生产服务和走群众路綫的問題，是社会主义科学工作的方向問題和方法問題，也是科学工作者思想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和两条路綫斗争的問題。不解决这些問題，科学工作就不能更好地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馬克思主义者認為：科学正如其他文化、艺术一样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一方面反映了經济基础，另一方面又必須为經济基础服务。从来的科学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直接或間接为生产服务的。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此，在資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超然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尽管某些自命清高的资产階級科学家，認為自己是“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实际上他們所有的科学研究成果，沒有不被資本家用各种方法使它直接或間接为資本主义生产服务的。资产階級的科学家認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从他們的个人名利出发而說的。因为資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到处都是被买卖原則支配着。科学家將他的研究成果，也作为商品出卖。商品出卖了，他获得了名和利，他的个人目的就达到了。为了这个目的，有人甚至于出卖自己的良心。因此，他們以科学研究本身为目的。但是实际的最終結果是买得商品的資本家占有其使用价值，用以为发展資本主义生产和巩固資本主义制度而服务。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結果被用于发展資本主义的生产。由此可见，从个人名利思想出发的资产階級科学家所标榜的“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不过是“掩耳盜鈴”而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有某些死抱住资产階級思想的科学工作者，还想“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那是肯定沒有前途的。

馬克思主义者認定科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在

社会主义下，它必然反映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并为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要求科学工作者自觉地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生产无限的发展服务。毛主席早就教导我們：世界上有两种知識，一种是和自然斗争的知識，一种是階級斗争的知識。科学就是知識。自然科学是探求自然规律的知識；哲学社会科学是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識，它的目的，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設中为生产斗争和階級斗争服务，归根到底是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服务。目前，全国各地都在以万馬奔騰之势掀起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在生产蓬勃发展中，許多新的課題就提到了科学工作者的面前，要求我們科学工作者去解决。我們科学工作者如果还关在象牙之塔中，对当前轟轟烈烈的生产大跃进运动不聞不問，袖手旁观。不把科学工作放在生产的最前綫，从解决当前的实践問題着手，不首先考虑推动生产发展，那它就和亿万群众的要求相违背，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济基础不相适应，不仅將无所成就，而且会被人民所遺弃。因此，我們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須放在生产的最前綫，从实际出发，面向生产，以研究和解决当前生产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为首要任务，同时結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設的長远需要，有划計地組織最新的科学技术和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从解决当前最迫切的生产問題着手，并不否定研究基本理論和现代最新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相反，忽視了这方面，就不能使我們的科学工作赶上最先进的国际水平。既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当前生产上存在着的迫切問題，又不能忽視長远的根本性的問題的研究，是矛盾，但又是可以統一的，这是对立的統一。毛主席在这方面就是光輝的典范。例如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著作，是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在当代的重大发展。但它就是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

命的实践出发的。它既是我国人民当前革命实践的指針，又是馬克思主义学說的重要发展，对許多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人民日报的社論指出：“历史的事实証明，科学技术的发明，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的需要而出发，各門科学的产生，无一不是同社会实践和物質生产的需要密不可分的”。①“科学工作者只有从解决当前生产中的实际問題入手，不断地吸取群众的經驗和智慧，才能为理論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和綫索”。②由此可见，为生产服务是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正确方向。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如何为生产服务？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有人有怀疑的。区夢觉同志在广东省第一次科学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对这个问题有概括的指示：“围绕生产的大跃进，哲学社会科学也应来一个大跃进。社会的生产总是离不开人，离不开人們之間的相互关系。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研究和分析人民的精神面貌，研究和促进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創造性，研究社会主义建設中所提出的許許多多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艺术的理論上的問題。这些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关系到生产的发展。这都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去加以解决”。

从当前的现实生活中，的确使我們体验到，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不仅許多科学技术方面的問題提到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面前要求解决，而且，由于飞跃进展的生产实践现实，同样也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那是有关社会主义經濟发展的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和由于阶级力量起了重大变化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的矛盾問題。这些都急待我們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以解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更順利地更迅速地前进。

例如，去年年底和今年初农业生产大跃进，逼迫着工业大跃进，逼迫着其他財貿工作大跃进。在发展工业方面，根据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与中小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針，提出县县办工业，社社办工业的号召之后，使我国工业发展以面目一新的姿态出现。在这个工农业大跃进的局面下，旧的平衡被冲破了，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生产資料的分配出现了不平衡，劳动力的分配出现了不平衡等等。由此，社会主义的經濟規律——国民經济有計划、按比例发展的規律如何在当前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发生作用的問題，就提到了經濟研究工作者面前。我們知道，在我国解决了生产資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以后，国民經济

有計划、按比例发展的規律已起着社会主义經濟的生产調节者的作用。这一規律意味着国民經济各个部分之間必須保持着某种比例，它要求有計划地领导国民經济，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經濟的一切部門，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国家的物力、人力和財力。但是在生产实践中，各部門之間的比例是經常发生失調現象的。这就是說，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經常地不断地要在实践中为某一先进环节所突破，出现了不平衡。要經過調节，然后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生产就向前推进。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这种矛盾和統一的辯証关系，不仅需要在哲学上加以研究，也需要在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原理上加以研究和解决，以打破某些消极的平衡发展論。再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一系列重大的方針和政策，如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提出积累与消費的合理分配……等等。都是根据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要求而提出的。这些問題也要我們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理論上加以研究和闡述。

价值規律在我国现在已不起生产調节者的作用，但是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存在，价值規律在一定的范围内就还发生着作用。因而，从研究价值規律如何在我国目前的經濟形态下发生作用，来着手解决当前由于生产大跃进而出现的某些价格問題，也是經濟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到：“我們所提到的地方工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发展，而不是盲目的、自由竞争的发展。”根据这个要求，我們經濟研究工作者就必须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研究如何合理分布社会主义生产的问题，如何最合理最有利地綜合利用各个經濟区的物質資源問題，各个經濟协作区如何进行經濟协作的問題。

对港澳、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研究，对我国目前的生产大跃进也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从今年4月到5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出口交易会的情况看到，我国出口貿易，有80%以上是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另一个情况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購買我国出口商品比过去大为增長（与去年交易会比較增長

① 見人民日报5月22日社論：“科学并不神秘”。

② 見人民日报6月18日社論：“地方也能大办科学事业”。

約2倍)。这就对我们经济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深刻化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我国的进口却增加了？因此，我们经济研究工作者必须研究在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平衡的对立的世界市场的新情况下，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亚非地区许多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成为民族独立国家的新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及其影响具有那些新的特点的问题，这些民族独立国家的当前经济特点问题，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它们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对我国当前对外贸易的扩展，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以上所述，只是从经济问题上略举数例来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从当前的实际出发，不仅解决由于生产大跃进而出现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基本理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他如历史、哲学……等等的研究，同样地有必要和有可能从实际问题的研究着手，贯彻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只有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才能反过来指导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它的应有的作用。

再谈谈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毛主席和党经常教导我们，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工作路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不能例外。但有些人还有所怀疑：别的工作好说，理论研究能不能走群众路线呢？如何走呢？理论学术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什么奥妙、高不可攀的东西，它是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者，正是历代以来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当然，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在过去，由于剥削阶级剥夺了他们学文化的权利，因而缺乏将丰富的实践总结成理论的水平。如果我们的研究者能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就能将我国劳动人民的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成理论，反过来用于指导实践。只有这样的学术理论，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学术理论。如果离开了广大群众，“我们的科学家就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以至隔绝。脱离广大群众的需要，就一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即使能搞出点东西来，也会因为远离群众的需要，而变成无用或用处不大的东西，不能给国家和人民以真正的帮助，对科学工作者本人也是莫大的损失。”①

走群众路线，具体的说来，我以为应从下面几方面去实践：

首先，是专业工作者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我们的研究工作，既然是要从实际出发，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那就必须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在实践中所发现的问题，与群众一齐动脑，共同来研究问题。比方要研究劳动力的分配和生产资料分配的问题，你就必须向群众了解各种生产部门所需要的劳动量，了解各个生产部门对生产资料的要求。研究价格问题，就必须从群众中去了解目前那些劳动产品的价格存在着问题。再如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目前应从研究近代广东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着手，那就必须依靠当地的群众或当时的革命实践者供给必要的生动的资料。这就将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有更丰富的内容；更能得出正确的全面的结论。就是研究辩证法，逻辑学，也必须要在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吸取丰富的内容。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如果不到广大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不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吸取材料，不依靠群众实践的经验，就算是研究出一些东西也将是带有片面性的，主观主义的。

其次是专业研究与社会上广大的业余研究力量相结合的方法。目前，我们正处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非常丰富的时代，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非常多，如靠少数专业研究人员是不能完成这巨大的任务的，必须动员社会上大多数的业余研究力量共同来担负这个光荣的任务。有许多参与各种实际工作的人，他们有较长久的生活实践，也总结了不少经验。必须将这些潜力挖掘出来，扩大我们的科学研究队伍，增强我们的研究力量，才能满足目前全国人民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对我们研究工作的要求。因而，如何组织广大的社会研究力量就成为我们的重要工作。

再其次是上下左右相结合的方法。在文化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全省各地的科学研究工作逐步开展了。例如，惠阳专区的科学研究所就已宣告成立。不久的将来，科学研究工作必定在各专区各县遍地开花，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到专区、县互相结合，共同合作。省与省之间也必须互相结合，进行协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大跃进，取得更大的效果和成就。

① 陈郁省长在广东省第一次科学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对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概念的理解

燕 丘

一、范畴是什么？

形而上学家眼中的世界，是无数乱杂的各自孤立现象底偶然堆积。他们认为现象之间没有任何规律性的联系，也没有基于自身矛盾发展所引起的运动，和本质的变化。形而上学所谓运动变化，不过是由外力所引起的位置变迁和数量增减，如此等等。这样的见解是远远落后于古代朴素的辩证宇宙观的。恩格斯底“反杜林论”提到关于古希腊自发的辩证法宇宙观说：如果我们留意考察自然、人类历史和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动，那么，我们首先见到种种联系及交互作用之无限错综的图画，在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保持着原来的性质、场所和状态，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恩格斯接着指出：这虽是朴素的，但实际上是正确的宇宙观。它正确抓住了现象的整个图画的一般性质。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说过：人们面前展开着复杂的自然（广义的自然，包括社会和人们底精神现象——引者）现象的网。

这“无限错综的图画”或“复杂的自然现象的网”，虽然是极度纷繁错杂，但并非象形而上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杂乱的各自孤立现象底偶然堆积。客观世界复杂的现象底外部和内部，存在着非本质的与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规律式的遵循着严谨的逻辑秩序，使客观世界成为组织严密的有机整体。这些联系中提炼条和环节，交织成“无限错综的图画”或“复杂的自然现象的网”。它们是在支配自然界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主导作用之下形成的。唯物辩证法底逻辑范畴，就是客观世界这种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在人们面前开展着自然现象的网。……范畴是区别的小阶段，即对世界认识过程中的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网，与把握这个网底网上的纽结。”这是范畴这个概念底经典性的描绘。

范畴和基本规律一样，都深藏在现象世界里面，不能由人们底感官接触，而它们在现实中的作用，

又并不是按一定次第机械似的运转，而是在同一时间空间、错综渗透，相反相成的情况下作用于客观事物底运动发展。写在书本上的规律和范畴，真要象它们在现实中活生生的作用那样，如实地反映出来是困难的，一条条的规律和范畴，只是一种只能如此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虽不能说是对客观法则的歪曲，但对它们底真实性的反映，只能是近似的。不但规律和范畴，不能无所遗漏地反映客观法则，人们更不可能将规律和范畴一次认识和反映出来。

虽然如此。但规律与范畴都是人类底认识与实践发展的历史底积累，即经长期的无数次实践所积累的材料，通过科学的抽象，从而提炼出来的结果。因之，它们虽只是近似的，却都有客观根据，在原理原则上的正确性，早已由历史所证明，革命导师们底经典著作又早已给我们以科学的论证，只要我们能正确地掌握，无论用以解释世界或指导实践，功效都是最显著的。如列宁所说对客观世界底认识过程中，自成区划的“小阶段”和“自然现象的网”和“网的纽结”，我们不但可以理论上领会，更可以凭正确的思考从客观现实中去把握它们。

在自然界现象中，如水由气温升降所引起的变化：液体转化为汽体或凝结成固体等过程中，每一飞跃出现的地方，都是个前后过程底交点。又如我国当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由个体农业到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运动发展过程中，如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三个步骤：个体经营——互助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合作社；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合作社——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三个步骤，每一次转化底关键，也都是个新旧过程底交点。从上一个交点，到过程终点。这点与点间底线索，是网底主要纲维。这种交点，是网底经线所构成的“纽结”。

每一个这样的交点，都是旧过程底终点，新过程底起点。从这一点到另一点，这当中的线索是很明显的：水底运动变化过程，是冷和热两种气温于

盾发展过程底綫索。个体农业发展到社会主义农业，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立斗争发展过程底綫索。每一过程，从起点到終点，自成阶段。一个过程底起点和終点之間，縱貫着回旋曲折上升的綫，这样的綫，無論在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中，都是起主导作用的，是每一事物內在基本矛盾对立斗争发展底路綫。但是，如果只有这么一条縱貫过程的經綫，还不能織成“自然现象的網”，自然界底組織如果是这么簡單，所有现象和现象間底联系之網，也就都无从構成了。

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基本矛盾发展底路綫，虽是紆回曲折的，但实际上是縱貫过程終始，除了这个有关事物本質的与必然性的縱貫过程終始，起主导的决定性作用底綫索之外，一事物和周围有关諸事物之間底联系又形成縱橫交織的綫，这样才構成现象界底“網”和網底“紐結”。这种与周围环境有关事物相联结底綫，就是一事物本身內在根据——基本矛盾生長方面底运动发展有利的或不利的、外部条件。发展过程底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虽属于每个事物本身基本矛盾底发展，但基本矛盾发展底路綫怎样曲折回旋，比如，矛盾底生長方面怎样获得充分有利的条件，因而順利地使发展的可能成为现实，或者遭受某些好象是意外的偶然发生的阻碍，使生長方面底发展迟緩下来，甚至形成暫时的逆轉等等，这些情况，不完全决定于基本矛盾生長方面底主观条件，周围的联系，即外部条件也往往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客观事物在运动变化中这种复杂交錯的本質的与非本質的內外联系之網及其“紐結”是遵循着严密的邏輯秩序而运动的，这种客观的条理和秩序，反映到人們头脑中，就成为邏輯思維体系：偶然性与必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根据与条件，原因与結果等对立范畴。

由此可见客观世界“无限錯綜的图画”或“复杂的自然现象的網”，它們內在的組織条理，每一个点，每一綫的安排，虽不是固定的、僵直的，却不是紊乱无組織的，而是服从着严密的邏輯秩序，这种邏輯秩序構成了客观世界自己底范畴。

由此可见，客观的邏輯范畴，就是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法則。它們虽然隱蔽在复杂的现象界后面，只要我們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却是可以多么亲切地去把握它們。非常明显，人們底邏輯思維、范畴和概念，决不是唯心主义者如康德所設想的那样：是人們臆造的主观邏輯概念加在客观现实之上，而是相反，人們不能加入任何主观因素，全是客观法則的反映。

二、規律与范畴底关系

范畴以基本規律为基础，在基本規律底主导作用之下，为补充規律而起作用。现在，我們試就辯証法三个基本規律，即对立統一，質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和我們所認定的某些基本的对立范畴之間底关系作个初步研究。

三个基本規律中底質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两个規律，实际上是对立統一这个作为辯証法本質和核心規律底补充，它們底实質，包含在对立統一規律之中：任何对立斗争发展过程，及新旧过程底交替，都是由量到質，由質到量的变化发展过程，質量互变規律是从質和量底意义上反映并补充对立斗争发展过程內在情况的。每一有限的具体过程，在无限发展長流中，不断新旧交替，逐級上升的运动，是否定之否定規律所体现的。所以否定之否定，是从新旧过程底交替、旧質态轉化为新質态，低級轉化到高級，这种不断上升的运动发展方面补充对立統一規律的。而質量互变，以及新物否定旧物，新物又孕育着否定自身底因素向前发展，又都是对立斗争发展底結果。所以質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两个規律，均为对立統一規律所統攝，且以它为基础，在它底主导作用之下，为它起补充作用底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了。

唯物辯証法諸范畴中，到处都可察觉基本規律底作用，只有否定之否定，是表示过程交替与不断連續上升运动的規律，在只表示一个过程——有限的小阶段底某些交錯联系的諸范畴中，除否定和肯定外，即使是有限与无限等对立范畴之間底联系，也不直接表现否定之否定，是当然的。

我們在这里，要考察如下各組范畴和基本規律底关系。

一、本質与现象；二、内容与形式；三、普遍与特殊；四、根据与条件；五、必然性与偶然性；六、可能性与现实性；七、自由与必然。这七組对立范畴，當我們就它們和規律的关系这个角度次第进行研究时，我們將看到基本規律底主导作用和二者密切的相互关系。

一系列复杂的现象后面，隱藏着內在的統一性，它們底变化发展所一致服从的規律，这并不是別的，就是規定它們共同本質的矛盾运动。某一过程中，现象如果起了根本变化，必然是它自身內在基本矛盾底生長方面否定了衰亡方面底結果，亦即对立双方力量一消一長底变化，由量底积累，引起

了本質变化底結果。这时必然是旧过程終結，新过程开始了。

这是基本规律在本質与现象这組范畴中底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在无限发展長流中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有它自己底內容与形式。如果要問某个形式为什么是这样，是什么力量决定它是这样？这是不能从形式上的研究获得解答的，当我们从形式内部了解了它底內容，从內容深处把握到它特有的本質(个性)时，我們就会知道某个形式就是某事物本身内部基本矛盾处于优势方面底力量所决定的。其次，任何发展过程底內容与形式两方面由统一到统一体分离底过程，也就是统一体内部对立斗争由量到質底变化发展过程。发展成熟了的新內容，最后突破那已陈旧落后的外壳——旧形式而解放自己，也就是矛盾底生長方面最后否定衰亡方面的結果。

这是基本规律在內容与形式这組范畴底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大致情况。

本質与现象是揭露现象界底本質；反映它們內在統一性或一般性规律的范畴。也是人們对客观世界的認識，由现象到本質，由具体到抽象，由相对到绝对，由偶然性到必然性，由特殊性(个性)到普遍性認識底邏輯法則。內容与形式，是具体研究具体的对象或现象單一的特殊性——特定的本質，从而处理具体問題，同时也是最显著地表现对立統一这个基本规律，在每一具体过程中，矛盾怎样由统一到统一体分离底范畴。

凡现象都是具体的，有它自己一定的內容与形式。人們底感官只能接触到客观世界底现象，现象界共同的本質——內在的統一性，或一般规律底認識，是从众多现象底具体的內容与形式底研究中，通过科学的抽象和概括而获得的。所以事物的本質，是舍弃了各个现象底特殊性或个性，專提炼它們內在的統一性与规律。由此可见，認識现象界共同的本質，必須从認識各个现象底个性——單一的特殊的本質开始。而內容与形式，是具体研究單一现象个性的范畴。所以本質与现象和內容与形式这两組对立范畴之間底辯証的联系，是普遍与特殊的联系，前者是由现象到本質，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后者是由具体事物底內容与形式把握个别事物特定本質或个性。客观世界內在統一性——规律性認識底不断深化与提高，全靠人們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对新事物特定本質或个性底認識来丰富的。而丰富与提高了的一般性规律就更深刻更正确地指导人們底具体实践，愈益深刻地認識單一事物

特有的本質，这便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断互相轉化与提高的相互关系。我們將普遍性与特殊性范畴作为第三組，安排在本質与现象和內容与形式这两組范畴之后，就是为了便于理解普遍与特殊这种辯証的关系和在認識运动中底作用，从而理解具体与抽象，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等等对立范畴底内部联系，而且了解这些对立面底联系即是现象与本質，个别与一般底联系。

由此可见，不能把本質与现象这个对立面，同等看待，即不能把本質与现象理解为从一个具体现象到一个具体的本質(个性)底認識法則，如果这样，就和內容与形式沒有区别，而我們也就沒有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普遍的認識方法了。本質与现象，不反映單一矛盾运动，反映矛盾运动个性或單一特殊性的是內容与形式范畴底任务。因此，我們觉得本質与现象和內容与形式，这两組范畴，不論其客观的作用与在人們底思維法則上都是不可分的兩組最基本的范畴。

第四是根据与条件这組范畴，特別显著的表现了对立統一的斗争与现象的本質与非本質的联系等方面复杂的辯証的关系。新事物底生長、发展全靠自身有健全的根据和适当的外部条件。所謂根据，即统一体中基本矛盾底生長方面，生長方面底发展，依靠周围有利条件，提供营养，借以保証生長方面，在对立斗争中，战胜衰亡方面，不使它成为阻碍发展的根据，从而最后否定衰亡方面。不然，衰亡方面，就將成为阻碍新事物发展的根据，使发展停滞下来。而新旧矛盾双方力量消長，最后新生方面消灭衰亡方面，也是由量到質的变化发展过程。至于怎样使新事物发展的必然性順利地实现，預防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偶然变化？怎样使新事物发展底可能性順利地成为现实，更显著地表现着新旧矛盾斗争和与外部条件联系底作用，因为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能否排除不利的偶然变化，而使自身必然发展的前途順利实现，以及新事物发展的可能性順利的成为现实，都是矛盾底生長方面战胜衰亡方面的問題，而新生力量底发展，与对立面的最后被消灭，也是由量到質的变化发展，而斗争胜利的保証是有賴于事物本身的根据——矛盾底生長方面主观条件健全，和外部有利条件底作用。所以根据与条件这組范畴和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这两組范畴底关系，特別显著。基本规律在这兩組范畴中的作用，也是很容易看出的。

由上面簡單的論述看，非常明显，各組对立范畴中，事物本身基本矛盾对立斗争发展底綫索和外

部条件联系底綫索縱橫交錯，織成了客观世界底邏輯范畴之網。事物底运动发展就这样被规律和范畴规定着。

正确認識并掌握了客观法則的人們，就清楚地認識了客观规律和范畴底作用，知道事物是怎样运动变化的，因此就能知道世界是怎样变化发展而来，又将怎样变化发展下去，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前进或逆轉并无一定。但不論怎样，新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又不可改变？这样，就能預见到明天将要出现的新事物，今天已存在于现实中的可能性，而且善于使这种可能性順利地轉化为现实，并預先防止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偶然事变的破坏、阻撓，这样，人們就能成为自然和社会底主人，自由地發揮創造力，主观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这样便由“必然的王国”进入了“自由的王国”。

规律底必然性，既为人們所掌握，自然，社会运动发展中，一切不利于社会生活的偶然变化，就愈来愈有可能預为防止，掌握客观事物使它們按照人們所預定的方針、計劃、步驟和目标，规律地发展。客观世界底因果联系，以及因果性，与规律等概念，也可在这里得到理解。我們把自由与必然这組范畴，排列在最后，作为辯証法諸规律和范畴不論在理論或实践意义上的綜合，也許是恰当的。

“自由与必然”这組范畴，还有个独特之点，就是唯物辯証法其他諸对立范畴和本組中心的“必然”，都是自然界固有邏輯概念，是独立于人們精神意識之外的客观法則，只有“自由”是人类进化到認識了客观的必然性规律，并正确掌握了这种

必然性规律之后，發揮了主观創造性底結果。当人們正确地發揮了主观能动的創造性的时代，自然界頑强的必然性和破坏作用，就随着人們底蒙昧无知与主观盲动，一齐在創造性的“自由”里被扬弃消解了，这样，必然就轉化为“自由”。所以这組范畴，一方面属于客观规律，一方面出于人們底劳动創造性，而二者的不断互相轉化，將使人类对必然性规律的認識与主观創造性的發揮不断地向着无限的未来逐級上升发展。

以上，就基本规律怎样作用于諸范畴及二者的关系作了簡單的說明。其次，再就諸对立范畴，怎样表现规律并补充基本规律的問題，略加闡述。

任何單一的范畴，并不表现规律性，但凡对立范畴两个方面之間底联系，却都表现一种规律，如我們在上面所論述的七組对立范畴，每組底对立方面底关系：比如本質怎样制約着现象，现象怎样反映本質；內容怎样决定形式，形式怎样作用于內容，最后，二者怎样由統一到分离；普遍性与特殊性怎样互相联系互相轉化；根据与条件，怎样互起作用，成为完成每一具体事物发展底內因和外因；乃至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間，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間，自由与必然之間底联系，都各自表现了一种规律性，而这些规律（凡对立范畴之間底联系都是这样）虽然都是在基本规律底統攝和主导作用之下形成的，但都是基本规律本身不能直接表现的规律，而必須由这种对立范畴之間底联系表现出来。所以，我們說，范畴为补充基本规律而起作用。

广东各地加强理論工作

中共广东省委于六月十二日发出关于加强理論研究工作的几項規定，要求县以上党委和省級机关各部委、厅、局在六月底以前都要建立起理論小組（或写作小組），組織干部对当前实际工作中的重大問題进行專題研究。

中共惠阳地委采取措施加强理論工作，要求各

县、市委理論小組要在六月底以前成立，并由第一書記挂帅，同时确定研究題目。今年要求全区在十至十二月前写出二百五十篇專題研究文章。

中共江門市委也已經建立了理論小組。

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广东省各地党政部門的理論工作將有一个大开展。

墨家論“辟、侔、援、推”

李匡武

墨家虽然很重視“亲知”和“聞知”——特別是“亲知”，以为最可靠，而且是一般知識的基础，但决沒有把它們看作知識的唯一途徑。他們知道有些知識是“不以五路”（即不靠感官）的，如對時間（“久”）的知識便是。知識也决不能停止于“見”和“聞”，却必有賴于“心之察”，才能“循所聞而得其意”。更概括地說，知識不但要靠感官（材），知的要求（慮）和與客觀事物的接觸（接），而且還要將感官所得借理智加以分析論列，以了解其意義①。反之，不借理智，是无法獲得知識的。事實上，人們也有許多知識是靠記憶和推理得來的。譬如火的热，不一定要被灼燒過才知道②。這種間接的知識就是所謂“說知”。

辟、侔、援、推等都是“說知”③的手段，“辯”或“說”的重要工具。

（一）辟——辟即“譬”或譬喻，比喻。在墨子中用得極多。我們經常可以在墨子中發現“譬之”、“譬猶”、“譬若”等詞，后面接着便是“辟”的例子。墨子善用“辟”，而且往往用得很有說服力。如公輸篇所載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軒，鄰有敝鑿，而欲竊之。舍其錦綉，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鑿也。荆有云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鼃鼃，為天下富，宋所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枏豫章，宋无長木，此猶錦綉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吏）之攻宋也，為與此同类。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

當時不但墨子喜用辟，其他學者（如孟軻等）也用得很多。惠施甚至以為不用譬喻便無法講清楚道理，因為“說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見說苑善說篇）。辟就是借用其他已熟知并多少類似的事物以說明某一事物。故小取云：“舉也（他）物而以明之也”。能作辟的事物必須多少類似，但也不必盡同④。這樣看來，辟并不十分難用，但也不能過於樂觀。如不好好地注意“殊類”的問題，辟也還是會不恰當甚或犯錯誤的。兼愛中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

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曰，是非其辟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墨子之意是說這個譬喻是錯誤的，因為二者毫無真正共通之處，一為可行的，過去聖王實行過的；一為不可行的，從來未有人實行過的。二者既無相通之處，若強以相譬，便違反了“異類不比”的規定。

辟是一種代替下定義的方法。墨子中除辟外，尚有許多定義，其中大半是釋名的（如“義，利也”，“行，為也”）。也有些是較精確的科學定義（如“圓，一中同長也”）。

（二）侔——“侔”就是“比辭而俱行”。但這種“比辭”也不是隨隨便便的。所以他們隨即聲明：“辭之侔也，有所止（至）而止”。因為侔已較辟進一步要求類的“殊”，否則便易犯錯誤。在墨子中，侔的應用也很多。例如：（1）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親士）。（2）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熟），衣服節而肌膚和（辭過）。（3）天之愛人也，薄于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于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于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大取）。

另一方面，侔的誤用也很多，特別是當它採用類似西方邏輯的“复合概念法”底形式時。小取中舉了不少這一類的例子。其中有許多是因種種緣故（詳后）而不能“侔”的。例如根據“船，木也”，不能得出“入船，入木也”；根據“其弟，美人

①經上云：“知，材也”。“慮，求也”。“知，接也”。（說：“知也者，以其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明也”。（說：“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又經下云：“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无以也”，說：“論，非智无以也”（從張校）。

②經下：“火熱，說在類”（從孫校），說：“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日”（從范校）。

③說知：“方不瘳也”，即不受空間以至時間限制的知識。

④小取云：“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

也”，也不能得出“爱弟，爱美人也”。

墨家的侷是否恰当，主要是依实际意义而定，决非只看形式的相类。过去有许多人不了解墨家的这种精神，以致给“侷”作了错误的解释。最典型的如胡适在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中解释“侷”时，曾混乱了阶级的立场观点，把公孙龙子迹府篇中的诡辩引作侷的例子①。迹府篇云：“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龙聞楚王张繁弱之弓，載忘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謂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謂人，而非龙异白馬于所謂馬，悖”。如果單从形式上看，“楚人非人”和“白馬非馬”就是侷。但实际上仲尼虽別楚人于人，他的意思是要楚王推对楚人之恩以及于所有的人，不可囿爱于本国的人。但他仍肯定楚人与人間的一定关系，决非將二者割裂。另一方面，公孙龙却夸大了白馬和馬的分別，把它們完全离掉，以为漠不相干。如果禁止騎馬过关，他仍然可以騎着白馬大搖大擺地过关去。孔子的人是包括楚人在內的；公孙龙的馬却没有白馬在內。这就是诡辯的特例。胡适等人竟把它和墨家的侷混同了。这个例子也可以表明：阶级立场观点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三）援——小取云：“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意即两种相似的事物，如其一具有某特性，則另一亦可能有此特性，故曰：“奚独不可以然”。这相当于西方邏輯中的“类比推理”。在“援”中，不但要顧到“类”，也較明显地包含了理由或論据（即“故”）的問題。两事物愈是彼此类似（或同类），則援的結果便愈可靠。同时，根据其一的某特性以推定另一亦可能有此特性时，理由充足与否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此，小取篇隨即指出：“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也不必同”。这兒着重“所以然”（即“故”），意即“援”是否适当，必須着眼于事物的“所以然”。因为现象或事实（“然”）尽管相同，其“所以然”仍然可以互异。經說下云：“臧今也死，而春也得之，又死也，可”，意即臧和春二人，臧以某病死，如春亦得此病，則可据以推測春亦可能死。

墨子有时用援的方法去說服別人，有时藉以指出对方的援的不当，以致陷于謬妄。前者如：“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

天下，未之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于二人？”巫馬子曰：“我是被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搯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耕柱）。后者如：“子夏之徒問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惡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則称于湯文，行則警于狗豨，伤矣哉’”（耕柱）。子夏之徒的錯誤，一方面是辟的錯誤，同时更重要的是援的錯誤。因为狗豨和人既非同“类”，据根狗豨的“有斗”去推定君子亦会“有斗”，这就是从“殊类异故”去“援”了。象这样的例子在貴义、公輸、耕柱等篇中还有不少。

（四）推——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取之同于其所不取者予之也”，意即据根某类事物之已知部分以推及其未知部分，也就是“以类取、以类予”之意。經下更說得明白：“推其所然者于未然者，說在推之”（从梁校）。又云：“聞所不知若所知，則两知之，說在告”。說云：“在外者，所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知）若所智也，犹白若黑也。誰胜？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老以尺度所不智長。外，亲智也。室中，說智也”从（邓高鏡校），意即根据亲知的室外事物可以推知未及亲见亲聞的室中事物。可见“推”也是一种以“亲知”为基础的“說知”。

推似乎比辟、侷、援都更高一級，更重要，在辯或說中也更有用。它对于类和故的要求也更严格些。另一方面，如用得不得当，也就更容易犯錯誤。它大約相当于西方邏輯的科学概括，而科学概括是真正归納法的灵魂。有人根据西方邏輯学的发展情况，認為墨家也不可能提出科学归納法。这是不适当的“历史类比”。归納法和演繹法思想都是从人类誕生（亦即邏輯思維的产生）的一天起便被运用——而且經常結合在一起运用。自然，对它們的自觉的理解、論述和运用（即建立为学說）要比較晚得多。根据战国时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况看来，特别是根据以墨子为首的墨家对于科学的贡献看来，他們对科学归納法的自觉的理解、論述和运用已非不可能，事实上他們已明确地提出了这

①虞愚等亦用此例。梁启超且大加称許，認為“甚好”。

方面的主張，我們还有什么理由去否定呢？（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贊成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異”、“同異交得放有無”等強釋為約翰·彌耳（1808—1873）以來的“類同法”、“差異法”及“同異結合法”）。不僅墨子中有“以往知來，以見知隱”（非攻中）的見解，當時的荀子也有“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非相篇）的主張。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却指明了當時確已有科學概括的自覺理解和論述。他們知道：只要“類不悖”，則“雖久同理”。

魯問篇曾載彭輕生子懷疑“以往知來”的推理方法。他認為“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答道：“籍設而（汝）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反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于此“又有奴（駑）馬四隅之輪于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彭輕生子說：“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墨子因此下結論說：“焉在不知來”。事物間具有必然的聯系或因果關係。根據過去的經驗，良馬固車比駑馬敝車可靠，故可推知應擇良馬固車以應急務，不容任何懷疑。

不過，墨家也很知道“推”不是輕而易舉的。它雖然很重要，但也易犯錯誤，關鍵仍在“故”和“類”，經下云：“推類之難，說在名之大小”。小取云：“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因此，在“以類取”的時候，不但要注意“類”的大小，還必須注意“所以取”之“故”。

墨子中用“推”的例子很多。如“是故比干之墮，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親士），即其一例。墨家不但自己時時運用推的方法，而且還不時指出別人因不善推而犯錯誤，以致“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例如尚賢下云：

“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此譬猶耆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

（5）辟、佞、援、推四者的關係——根據以上討論，可知它們基本上是按照對於“類”和“故”底要求的嚴格程度而排列的。有些人在解釋時把它們任意顛倒，即由於沒有認識它們的關係。其次，它們雖各有特點，可以分別討論，但在辯或說的實際應用中往往被結合運用。舉一兩個例子便可清

楚。非攻上云：“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茲（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搯（挖）其衣裳，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這個例子包含辟、佞、援、推的并用。以“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為喻以明不義之行，這是辟。以“攘人犬豕鷄豚者”、“入人欄廐取人牛馬者”、“殺不辜人也，搯其衣裳、取戈劍者”等與“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者”比辭而俱行，這是佞。根據“殺不辜人也，搯其衣裳、取戈劍者”的不義，以斷定攻國者亦不義（且更甚），這是援。從全段的種種事實和理由以概括出“天下之君子不知義與不義之別”底結論，這就是推。

墨子特別喜用這種由小至大、由近至遠、由見至隱的推理方法。這種方法可以稱為“波浪式的推理方法”。它的優點在能層層擴展、步步為營；當用得適當時，可以是正確的（如上例），也可以具有一定說服力。但它也有缺點：（1）假定“波浪”與“波浪”間是平鋪地、均勻地發展的，卻沒有注意到其間可能有起伏、疏密的不同——有質的差異。（2）這種擴展可以無限制地進行，有時且使神秘的事物（如“天”、“鬼”等）由此獲得了“證明”。例如天志下云：

“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可）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戒（儆）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

這個例子即具備了上述的缺點。“處家”與“處國”已有性質的不同。“處國”與“處天下”更不應相提并論。而且照這樣推理，“天下”之外還可以再“推”出更高的另一物（如“天上天”），“天”和“天志”便不見得是最高的主宰了。因為關於“天”

及“天志”的推测已完全离开了“亲知”，完全失去了唯物主义的認識基础。那末，有什么理由不許別人作进一步的幻想呢？

墨家对于这些困难，似乎沒有自觉。但他們对于辟、侔、援、推的应用也不是完全乐观的。因此，他們在小取中分別介紹了辟、侔、援、推之后，接着便声明：“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轉而危（詭），远而失，流而离本，則不可不申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①，殊类，异故，則不可偏观也”。換句話說，在使用它們于辯或說時必須十分小心謹慎，務求不异，不危，不失，不离本——归根到底，主要是“类”和“故”的問題。墨家之意，要經常注意到不同“方”（道）的“言”，避免把“殊类”看成同类，把“异故”当作同故，因此要“尽见”而不可“偏观”。否則对于分歧的推理现象便不易理解。小取云：“夫物或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不是而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也”。为什么会有这些参差呢？主要就是实际上的类和故的差异。若徒取形式，对于它們便无法解释。

所謂“是而然”，是指从一个肯定的命題（前提）推得另一个肯定的命題（結論）。如据“白馬，馬也”以得“乘白馬，乘馬也”②。如仅按形式去推理，則据“获之亲，人也”亦应得“获事其亲，事人也”。但这結論是不正确的。因为一方面“事人”一語习惯上有特殊意义，而且这里获所事的是“其亲”而非所有的人。“人”和“其亲”两概念有广狭的不同，因此，“是而不然”（根据，一肯定命題推出一否定的結論）。另一“是而不然”的例，如根据“車，木也”，似应推得“乘車，乘木也”。但因“車，木也”与上述的“白馬，馬也”只有形式上的类似——实际上“白馬，馬也”是指“白馬是馬的一种”，而“車，木也”則謂“車是由木構成的”，因此不能据以推論“乘車，乘木也”。

其次，所謂“不是而然”的例，如“且（將）讀書，非讀書也”，而“好讀書，好書也”（从孙校）。这是因为前一命題指尚未实现的可能情况，后一命題則指业已实现的事实。故有肯定和否定之分。

以上“是而不然”和“不是而然”的道理，本来是不难懂的。許多其他的情况也与此同类，但为什么“世有彼而不自非”，而“墨者有此而非之”？他們以为沒有别的“故”（理由），只是世人“内膠外閉，与心毋空（孔）乎”；也是就說，“世人”一方面“外閉”——不知着重客觀物理，忽視实际經驗；另一方面又“内膠”——心有所教，“不明于道”。

此外，所謂“一周而一不周”，意即在下判断

时，有时須普及有关事物全体，議論（或“說”）才能成立，有时却不必如此。这也要依实际情况来决定。各人所自的“方”（道）也有关系。例如从墨家的观点出发，“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墨家主兼爱，故“爱人”必須普及人的全体。但对于“不爱人”，則只要对一、二人不爱，固已为不爱人，毋須遍及全体的人。至于其他問題，要求便有不同。例如：“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后为乘馬也。有乘于馬，因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后为不乘馬”，意即所謂“乘馬”，只要乘馬一次或乘一馬，即可成立，不必將一切馬都乘过或經常乘着馬。至于“不乘馬”，則必須对任何馬也沒有乘过一次，才能成立。这是从实际出发的习惯上的看法，与“爱人”一例要求不同。

最后，所謂“一是而一非”，意味着推理要顧到具体情况及习惯用語，不能徒取形式，否則便会犯錯誤。例如：“桃之实，桃也”，但“棘之实，非棘也”，因为桃之实习惯上人皆称为“桃”，而棘之实却不称为“棘”。又如：“之（此）馬之目盼，則为（謂）之馬盼”，因为馬盼与否是以它的目为轉移的。但“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却因馬的大小并非視它的目之大小而定。

綜上所論，可知墨家的邏輯学說貫串着“摹略万物之然”的精神，也可以部分地說明他們不重形式本身的推演的緣故。这些例子是为了說明在辟、侔、援、推中應該特別着重結合实际，尊重习惯用語，并反对形式主义的詭辯。它們決不只是“侔”的例子③，而是辟侔援推并用的例子。譬如“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护，人也；爱护，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在这段中，举“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以明“是而然”的道理，这是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与“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比侔而俱行，这是侔；因“乘馬”的例之“然”而論及“爱人”之“可以然”（获，人也；爱主，爱人也），这是援。概括所“取”的乘馬及爱人諸例，以得出“是而然”的总的結論，这是“推”。余例亦可仿此分析。

①“多方”应讀如“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公孟）的“多方”，意即各家异道，言虽貌同，仍未必真同，故必观其究竟。

②此例頗似“复合概念法”。但因中国語言結構关系，复合的概念可以是动词。这是一般“复合概念法”所无的。

③詹剑峰氏尽举“是而然”、“是而不然”、“不是而然”及“一是而一非”諸例仅以为侔的說明，誤。

考工記的“輪人”

侯 过

考工記是我国最古的一本科学技术書，記录了我国汉代以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考工記开卷說：“国有六职，百工居其一焉……。审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百工，均是概括的話，郑司农以五材为金木水火土，郑玄謂水火不能單用为器物，故以金木皮玉石为五材，虽較确当，但就通俗的五行來說，玉应屬土，且分工上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二，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其中刮摩只用工具，不作为材，而設色的顏料亦是材，是五材又可說是木金皮色土，若說材只五，則弓人取六材，其中除干为木材外，都不在此五材之內，这里不想研究。但木为五材之一，攻木为五工之首，攻木之工七以車为先，輪为車的最重要部分，故考工記的工人以輪人为首，輪人與人車人輶人，都是以造車为职务，又加以設色繪画皮革等附屬的工，經過多数工人才成一車，“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为多”，几种职工，分工合作，对于造車的材料采用，車的等級制度，种类用途如行山行澤田猎战伐，制造方法，形式高下，各部分名称，構造尺寸，并人的登降，馬力負担，运轉迅速，車盖裝飾，使用安全，都有記載。真如訓雋所說“詞虽径省，而包含尽物，字虽奇峻，而亲切依人，終日言之而不尽其美”。車是封建帝王的主要御用器物，故特別隆重，設置种种專官專职来管理創造。这一些几千年的陈迹，多成了糟粕，木輪发展为鉄輪膠輪的时代，有无研究的必要，姑且不論。仅就閱讀中感到輪人是一个科学技术工者，同时感到植物生理学、木材利用学、应用力学等和一个車輪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举出一二事，以见我国几千年前的人民科学技术水平的一般。

輪人为輪

輪在車上的位置和重要性：車的好坏，关系于輪的工拙。因为車載于地上，和地面相接触的只有輪，所以說“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看車

先看輪，也就是說造車先造輪。近代汽車火車由机器发动，車体最重要的部分为車头的机器。但是車的負重力和运轉力仍在車輪，机器只能代替人畜的牽引力。

輪的任务是負重和运行，負重要强固而耐久，运行要迅速，所以說“察車之道，欲其朴屬而微至，不朴屬无以为完久也，不微至无以为戚速也”。仅仅廿余字就把輪的本質，輪的效用，簡單地說明了。

微至的意义：在几何学上一个圓圈上和一条切綫，只有一点相接触。因此假定一个輪，如果做到极圓，而道路又是平如砥（磨刀石）直如矢，使輪在路面上和路面相接触的只有一很小的点或綫，这就是微至。这样的状况下需要的牽引力很小，必然轉得很快。但这是一个理想，因事实上木虽是坚硬，也总有多少弹性，而道路的泥土砂礫，也决然不能够真平坦的。輪圓道平只能要求达到相当微至的程度。近代火車用鋼鉄做輪和軌，汽車的膠胎要空气飽滿，市街路面要鋪腊青，就是为减少輪和軌或路面的接触，达到运行疾速的目的。

几千年前的人民，就研究过接触点要微小，才能运行疾速，这不能不說是先民的科学技术有高度的水平。

在科学上，輪与地面的磨擦力，是和接触面积为正比的，接触面愈小則磨擦力愈少，因而需要的牽引力遂少，磨擦力是物体与物体的磨擦系数和重力的相乘积，而牽引力的最低限度要打赢这样磨擦力，才能进行，关系式如次。

$$\text{磨擦系数}(a) \times \text{物体重量}(k) = \text{磨擦力}(M) = \text{牽力}(T) \dots\dots (1)$$

通常道路面的磨擦系数 a 用坡度的最大限度百分率来表示如第一图

$$a = \frac{c}{b} = \frac{n}{100} \quad ak = M = T \dots\dots (1)$$

但这是在平地路面上的磨擦用斜坡来表示，(实验数)。若輪在斜坡上进行就依照第(2)式計

$$T = ak + a'k - \dots (2) \quad a' = \frac{c'}{b'}$$

(2)式如果斜坡到了限度 $\alpha' = a$ 的時候

$$T' = 2AK = 2T \dots (3)$$

即等于平地上的牽引力的二倍了。此即駟人所載“故登陟者信任者也”。通常一个人的手車到了上斜坡的時候，必然要一人幫助，就是這道理。這不是几千年前人民的高度科學水平嗎？

輪的大小影響車的高低，從而影響人的乘降和馬力的負擔。輪太高則人的乘降不便，輪太低則馬力的牽引辛苦。書中云“輪已①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②瘳則于馬終古登陟③也。”是合于科學的。輪高不便人的乘降，意很明显；且說輪庫馬如登陟。

輪和馬力的關係，假令車輪六尺六寸，則半徑為三尺一寸五分，馬的高約六七尺，車轆（駟）約在水平面上進行，牽力可依第(1)式計算。若馬高而輪低，照力矩的關係，則為：

$$TR = T_1 r = M \quad T_1 = \frac{R}{r} T \dots (4)$$

RY為大小兩輪的半徑R大於Y很明顯的 $T_1 > T$ 因為馬身高於輪，馬的牽力方向成為 OT_1' ，故

$$T_1' > T_1 > T \quad T_1' > T \dots (5)$$

証明了用小輪，比于用大輪，需要水平的牽力比較大。傾斜的牽力更大。換一句說，輪越小而馬越辛苦，假如(4)式中小輪半徑等于大輪半徑的一半， $R = 2r$ 就是

$$T_1 = \frac{2}{1} T = 2T \dots (6)$$

須要牽力比用大輪要多一倍以上即

$$T_1' > T_1 \quad \text{即} T_1' > 2T \dots (7)$$

正和前面所說馬在斜坡上拉車，同樣的費力。也就証明了几千年前“輪已庫則于馬終古登陟也”的理論，是經實踐後得來的結論。也証明了几千年前的人民，已經有了高度的力學知識。

車輪大小和速度的關係 同一牽引力、牽動大輪轉一周的距離，長于牽動小輪轉一周的距離。假如大輪直徑，二倍于小輪直徑，則大輪轉進的路程，就二倍于小輪轉進的路程。因此可以說輪太小則已使馬行如登陟，又使速力減小，同時受兩種的損失。

輪的構造和材料：輪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中

夾貫軸的稱為轂，周圍是牙（輞），聯絡轂與牙之間而支撐着的為輻。“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無疑是轂、輻、牙。但斬三材古人都作為斬木解釋。其實斬字并不一定是斬木（伐木）的斬，而是斬字別的有关製造如裁斷削切等的意義。材是木材，是離開生長地的材料，不是生在山中的木。斬材是造材，和下面斬轂同一意義，而非山虞的斬木。這是因為斬木是山虞的職務，不是輪人的職務。造材必以其時，可解為不以其時就沒有材料，也可以說非是以時所斬的木就不用造作三材。細玩其下文三材玩具的具字，就可体会到決然不是山上的木，而是制輪用的材料。

三材是否用三種木材，也有問題，鄭司農引今世轂用桤榆輻以杞（槐屬）牙以櫟（又名櫟枕，萬年木等）必是事實。但适用于造車輪的木材是很廣的，輪人的三材是三件材料，不必指實三種樹木。三種木分造三材固然可以，一種木做三材用也可以的。木有陰陽的不同，陽木有適合造輪的，陰木也有適合造輪的。但必用斬代以時的木材，是主要的要求。

木的伐采季節和木的陰陽：斬木季節，周禮中有兩樣的記載，一為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一為秋官柝氏夏日至刊陽木，冬日至剝陽木。山虞的斬木，是采伐木材供製造等用途，柝氏的刊剝，是為着翌年開荒耕種要除去草木。鄭氏解釋輪人的“斬三材必以其時”是根據山虞斬木時季來的。

木的陰陽

北半球地域的氣候，是南方暖北方寒的，北半球地域內的山岳，是南面暖而北面寒的。考工記一書，古代學者認為是西北人之書（因為沒一事說及舟）是正確的。西北多高山，如秦嶺山脈的終南山、大白山、驪山、華山、驪家山，黃河北岸的賀蘭山等，有些高的山頂上，終年積雪，山南山北的氣候相差很大，因為山北部分日照時間較少，據圭人用土圭“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所測的景，鄭注說：夏至尺有五寸，冬至丈三尺。而釋者又說立八尺之表，夏至日的景一尺五寸，冬至日影一丈三尺與圭影相同。圭與表相差六尺五寸，而影却相同，很會使讀者懷疑，但從科學上可以了解的。鄭氏注和釋者都沒有說明測影時所在地點，如果不是同一地點誰是誰非無從判斷。但山南山北的

① 已太過

② 庫同卑

③ 陟同陟

气候不同，是很明显的。山南地域一年中有日光，树木从早春发芽至晚秋停止，其間生長发育的时期很长。同时就一般說，山南地面的水分，受阳光的影响，容易蒸发，土地比較干燥。所以山南树木在長期間緩緩生長，而材質比較坚实。到冬季成熟可以斬伐，所以仲冬斬阳木。反过來說，山北地区一年中沒有几个月有日光，直到春末树木才发芽，不到秋末就停止了（西北地方阳历九月中榆柳叶已萎黄）。中間生長时期很短，同时山北經常水分充足，所以树木生長很快，一到秋天木材沒有坚实，生長就停止了。因此留他过一个冬季使木材坚实后，到过了冬才斬木。但是不是木材要到仲夏才結束才可以斬伐的。不是的，树木停止生長經過冬季一个时期会使木材坚实是正确的，但不必要半年的長時間。山虞仲冬斬阴木，仲夏斬阳木，可能是从时节和树木生理的关系，是这样考虑斬木工作和木材处理的：第一，伐木时节必在农閑季节的冬春之間，或春夏之間。第二，伐下来的木，第一步要剥皮，剥皮工作，必在秋末冬初树液尚在流动，或春夏間树液开始流动的期間。第三，天气寒冷，伐木工作不便，山南天气暖和，所以先斬山南的阳木，天气最寒时节由旧历12月冬季至翌年二月（阳历三月）間，可能利用积雪来运输木材，或从事制材工作。到了三月四月（季春孟夏）清明前后，北方树木也开始发芽生長，树液开始流动，本来可以斬木，但因这时候正是农忙季节，必待五谷麻豆已栽到田地以后，直到仲夏（四五月）农閑季节才又上山伐木造材，这是山虞的整个伐木造材工作进行规律，决不是为輪人需要材木而考虑斬木季节的。輪人需要阳木則在冬季入山采購，需要阴木則在夏季入山采購，或者就在山中制成零件，然后运出来，一季不足則两季購制，必待木材已备（具）然后由巧者（良工）和之即如今日工厂中先分工制造零件，然后調整配合成为器物。

同一树种，生在山南的比生在山北的，材質較致密而坚实，这是阳光多而生長期間長的原故。但从整个林木經濟价值來說，山北的木材常优于山南，尤其通直長大的木材，多产于山北。主要原因，就是山北土地阳光不到，經常潤湿，故山北多美丽的林相，优良的木材。以上是同树种不同气候，发生的阴木阳木。又从树种特性上也有阴木阳木的种类。一般枝叶繁密树冠能郁閉的如檜、柳、杉等为阴树。枝叶疏散不能郁閉的如松、有加利等为阳树。

木材的阴阳两面：輪人“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阴阳”，这里的阴阳，是說木材有阴阳两面，和上面的阴木阳木是不同的。斬穀是造穀，不是斬伐树木，和前一个斬字的意义是相同的。矩是測定穀材的阴阳方向，不是入山中刻識于树上。

这里的阴阳，总和上面不同，但同是因为日光所影响的。林緣树木及孤立木，在長期生長中，一面阳光充足（特别是向南的），一面向林內沒有阳光，因此阳一方面則枝大叶多，阴一方面則枝叶少。相反的树干的材积生長，就阳方小而阴方大。若將其树干切开，检查其横断面的情形，树心（树髓）不在中央而偏在南方，年輪（每年一輪）則南方薄而北方厚。所以南方（阳）的材質就致密而坚实，北方（阴）的材質就粗疏而柔弱。正如輪人“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样的两方面疏密不同的木材，拿来造穀是不合规格的，必先將木材加工改造。第一先矩定其阴阳用墨或刻識阴阳方向的綫；再用火熏炙阴的（北）一方面，使阴方材質受高热而收縮，使材質稹坚等于阳材，將來造成穀后，各方向的負担力都均一而耐久。此外林緣树木或孤立木生長中經常受一定方向的风（如地方风海风）吹，也会使年輪不圓勻；材質不一致，不一定是阴阳关系的。但这些已和本文沒有关系，这里就不詳說了。



从陈白沙的詩詞論証他的哲学思想

聞峻

“理論与实践”第二期刊出了章沛同志的“关于陈白沙的哲学思想問題”一文后，接着在第四、五期合刊上，又有李錦全、陈玉森二同志撰写了“陈白沙哲学思想是唯物論的嗎”一文，对章同志論述的諸有关問題提出異議。我認为这样的討論对于整理中国哲学遗产是有好处的。现在謹根据我在讀白沙詩詞的过程中所发现的白沙哲学思想，把它初步补綴成篇，用以就教于章沛、李錦全、陈玉森等同志及研究哲学史的同志們。

現存的白沙著作从份量上說，詩所占的比例达十分之六七以上。白沙重視自己的詩并且也常常用詩的形式表达他的哲学思想。他在“認真子詩集序”里这样地說：“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动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禽兽。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风花雪月之品題，一而已矣。”（白沙子全集卷一）白沙在这里是認为詩是能“載道”的。有人以为詩所吟的只是江山草木云烟虫魚等等，无补于世，因而以小技目之，白沙就說：“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白沙子全集卷一）在“濬齋先生挽詩序”里，白沙还認为詩最能表达人的心志“不可苟”和“不可伪”的；他也曾把自己所作的一些詩“序而藏之”，認为是誠意所发，辞不虛假”（白沙子全集卷一杂詩序），可見白沙的詩詞里蘊藏有哲学思想，而把它探索出来，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一、道是什么？

“道，”在白沙哲学思想中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东西，这一点，在章沛同志和李錦全、陈玉森二同志的論文中都已分別論述过，問題的癥結是集中

在“道”的性質这一范畴上。

章沛同志断定白沙的“道”是具有宇宙万物的本体、实体意义同时又具有总体意义，因而得到的結論是：白沙的哲学思想应该是唯物主义的。李錦全、陈玉森二位同志象章沛同志論述問題一样提出許多例証，認为白沙的“道”，是超乎形气之上的东西，不可能具有整个宇宙实体的意义。

这两种意見是不可調和的，不是这一方面对，便是那一方面对，到底誰对誰不对呢？我不敢妄加軒輊，謹先从白沙的詩詞里去发现問題，由白沙自己来作評判。

在白沙的詩里，和在他的文章里一样，他是屢屢提到道的，不过，有时他把“道”改作“吾”；这个“吾”或者是“得道”之后的“吾”。有时他把“道”用“春”来暗示，其实，“吾”、“春”等等字眼，都是白沙說“道”的同义語。这一点，我們在玩索白沙詩詞的时候，自会明白他的用意的，毋庸贅述。

白沙在詩詞里表述他的“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这里首先引他的两首詩为証。詩云：

“我道非空亦非小，万事舍旃終未了。”（白沙子全集卷六，寒江独釣）

“常疑大块本渾全，不受人間斧凿痕。”（白沙子全集卷九，云封寺有曲江遺象）

后两句話詩承認大块的客观存在，前两句詩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他是說道不是一个虛无飄渺的东西，而且大到为万事所含，万事离开“道”就“終未了”。这所謂“終未了”，翻成现代語，应当做“不行”即“不可以”解。他是說：道在物中，意即“道通于物”，“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得之为人”（白沙子全集卷一，論前輩言錄視軒

冕坐視全至下)，如果“舍之”則天不得为天，地不得为地，人亦不得为人。这样存在物中，物若离开它，便会失掉自己的存在，可以想见，它并不是一个“主观精神”之类的东西。只是白沙所处的时代科学不发达，无以名之，名之曰“道”而已。我們若把这个道解作为物質的元素，則可一齐穿鑿起来。原来他的“道”，的确是物的本体和实体。白沙所謂“道为天地之本，也就是这个意思。

白沙在“和答王愈宪乐用”（白沙子全集卷六）一詩里又这样說过：

“一物春知物物春，一年春亦万年春，总在乾坤形气内，敢誣当世謂无人”。

这首詩的“春”是暗示“道”的。这个“道”，他更明白的說出道是在“乾坤形气”之内的，和前詩引証的东西对照起来看，我們是用不着怀疑他的道是另外什么精神之类的东西了。

的确，白沙也曾說过，“天地之大，不足与侔，天地始終，无所增損”的話，并且还說过天地与道相比，只是“太仓之粟，滄海一勺”。这似乎是說：

“道”在空間上比天地大，在時間上比天地長久。誤解的人，也許會說：天地之外的道寄托在那里呢？

据我从白沙的詩里所得到的解释是这样：白沙心中的天地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而且只是把天或地做为一种單一的物件來說的，上浮者为天，下凝者为地，举天与地而言，只是两件东西。

在未有天地以前，宇宙是怎样的呢？白沙在“太极涵虚”（白沙子全集卷五）一詩里这样說：

“混沌本有初，渾淪本无物。万化自流形，何处寻吾一”。

从这首詩里，可以知道他是認為天地是有“初”的，天地的前身就是“渾淪”。“渾淪”不是具有形体的“物”，但是渾渾淪淪存在着的“气”。天地脱离“渾淪”的状态才有天地。实际上，他所指的天地，是不包括“渾淪”在内的。所謂“道”比天地大，比天地長久，只是对天地尚“有初”，在天地外尚有其他东西而言。意思是在天地之前，吾道寄居在“渾淪”之中。除天地外，尚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为道所寄。因此，他才說：“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白沙子全集卷一，論前輩言錄視軒冕坐視全至下），又說：“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为牛，馬自为馬。”他簡直把天、地、人甚至和牛、馬一样看成是一种單一的事物。在“次韵张东海”（白沙子全集卷六）他說：

“老去人間久廢談，青衫不改旧图南。道超形

气元无一，人与天地本是三。何物座中春块北，几时鏡里雪鬢鬢，白沙詩語如禪語，試着南安太守參”。

这首詩不特指出“道超形气元无一”，說明道不能超形气；而且明明指出天地与人为三，这样，天地与万物万物对比起来，当然，天地也只是万事万物中之二。就單位所代表的量來說，当然，天地只是万率万事中的“太仓之粟，滄海一勺”，这从哲学思維上說，是可以說得通的。“道”寄居在万事万物中，天地只是万事万物中的两件东西縱然天地很大，但从單位上計算，它当然不可与道相伴。

白沙从来沒有說过“道”先天地万物而生的，并且在他的詩中，常將“道”和天、地、形气等等相对待而言。如他在“晓枕”一詩里說：

“天地无穷年，无穷吾亦在。独立无朋儔，誰为自然配，春陵造物徒，斯人可神会，有如寿匡者，乃我之儕輩，永結无情游，相期八弦外”（白沙子全集卷五）。

这詩的的“吾”，若与“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无所損”（白沙子卷一論前輩言錄視軒冕坐視金玉）等語參看，則为得道以后的“吾”。这个“吾”，和阿芬那留斯的“原則同格論”是大有分別的。第一、白沙提出为“自然配”的，是“道”而不是“我”。第二、白沙的“吾”，是經過“得道”的過程即掌握了真理的“吾”，並沒有單純強調“我”的作用。他这首詩的总的意思是說“道”与天地共在，而且是永結无情游的，不过只能神会罢了。在“示諸子”一詩里，他又說：

“无人无我无古今，天机何处不堪寻，风霆示教皆吾性，汗馬收功正此心，水火鼎中皆玉液，鴛鴦譜里失金針，道人欲向諸君說，只恐諸君信未真”（白沙子全集卷八）

这首詩是說沒有人、我，沒有人类的古今，但道还可寻到。这个道在风中、在霆中，如以人类來說，也可以在汗馬中，（讀者須玩索他那一个“正”字），正因为道无不在，所以水火鼎中皆玉液。但道不能說出来，因为說出来恐怕人家不相信这些平凡的东西有“道”，于是只能欲說还休，欲說还休，讓能体会道者去神会了。

綜合上列各个詩証，我們可以这样說：道是宇宙万物的总称。正因为这样，所以白沙在“示湛雨”的四言詩里这样說：

“有学无学，有觉无觉，千金一瓢，万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鸞飞魚跃。

得山莫杖，临水莫喝，万化自然，太虚何说。
绣罗一方，金针谁掇”（白沙子全集卷八）

这意思是说，不管有学无学，有知无知，贵到怎样，贱到怎样，总之，道在物中是随自然流行而真机活泼的，活泼到“水到渠成，鳶飞鱼跃”那样自然。最后只能让万化自然，不能说出它的“太虚”来，也就难把“金针度与人”。事实上，它既然是宇宙万物的总称，如果硬要说出来，那就只有象告诉瞎子以太阳的故事那样，说它象铜盆，那就遗漏了燭火。所谓“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就是因此原故。白沙对这种只能神会不能言传的“道”，有时只能这样说：

“虚伪里面昭昭应，影响前头步步迷，说到鳶飞鱼跃处，绝无人力有天机”（白沙子全集卷五，赠周成）。

这个“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又看不见，只能用“按道之方”，“状道之术”来解决，如果要在物质中单独抽出来看，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白沙在“寄张主事一诗里又说：

“从来妙处不传书，十梦人间九不如。试问十洲三岛外，白云谁伴老仙居”（白沙子全集卷五）

这大概是白沙的难言之隐吧。然而也只能怪当时的科学不发达，不能象我们今天这样有化学这门科学，可以把它分解出来，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白沙亦无可如何也。

道既然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实体，宇宙万物的总称，自然，“道”是随着宇宙万物而自然运行的。这一点道理，在白沙的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

“一痕春水一条烟，化化生生各自然，七尺形骸非我有，两间寒暑任推迁”（白沙子全集卷九，观物）

“乾坤真妙此台开，一一皆因造化裁。意了梅花难着句，眼空江海笑浮杯。未分无极源头在，谁画先天样子来。碧玉楼上闲隐几，千山辽又川回”（白沙子全集卷八，再和碧玉楼诗）

“坐忘一室内，天地极劳攘，颠浪雷殷江，流云墨推障，高田水灭顶，别坞风翻浪。大块本无心，纵横小兒状。江门三两诗，饞舌天机上”（白沙子全集卷五，8月24日颶作多溺死者）。

“拈一不拈二，乾坤一为主。一番拈动来，日出扶桑树。寂然都不拈，江河自流注，濂洛千载图，图书乃宗祖。昭昭圣学

編，授我自然度”。（白沙子全集卷五，讀张地曹偶拈之作）

这几首诗提到“水烟”、“乾坤”、“浪”、“云”，意思都是“化化生生”都自然的，不受人间斧凿，真如小兒一般天真无伪，人如要拈动它，也只能拈出个“道”来。不去拈动它，它还是江河流注，自然运行的。我们说：整个自然界，从物质的最小的原子到巨大的天体，都处在运动和发展中，而白沙正是这样来了解他的“道”的。

白沙在诗里有时把“理”、“性”代替“道”。

“理”、“性”，的确是他的“道”的同一意义的用语。不过，要分别的是：对整个宇宙万物来说，他常常用“道”字来说明他的“道”；对一般事务，有时就用“理”或“性”来代替“道”；对人，则用“性”或“情”来代替“道”。道是包含着“理”和“性”的。在他看来，“理”和“性”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可以说“理即性也”，但不能以“理”来代替“性”。他的“理”、“性”之间的和“情”、“性”之间的关系都是密切的，在“与民泽”的诗中，他这样说：

“圣人之学，惟求尽性。性即理也，尽性至命。理以化迁，化以理定。化不可言，守之在敬。有一其中，养吾德性”（白沙子全集卷八）

在“送李世卿还嘉鱼”一首中，他又这样说：

“在物有常性，水湿而火燥。在人无常情，所恶变所好：昨日见其恭，今日见其傲。”（白沙子全集卷九）

这个“性”、“理”、“情”，在白沙看来，都是客观存在的，或“有一其中”的，不过，因为人有其“主观能动性”，所以无“常情”。这种“常情”，也不脱离人的喜、怒、哀、乐等固有的心理状态。物之有“性”或“理”，正如“水湿”、“火燥”一样，不是受人的主观作用决定的，因此，白沙的“理”，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非物质性的东西。“化”，是“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

“理以化尽”，是说物理的变化不超过“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而“化”，又必须根据物理的本質屬性性来决定。“理”在这里，是当做物质的本質屬性来解的。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白沙的道是什么；而且可以清楚白沙是在辩证地理解他的“道”，说明他的“道”。他不能象我们今天这样具体的明确的运用哲学上的词汇来表达他的思想，只是受了时代的限制。但是，我们不能厚责古人；更不能因为有些唯心主义者用过“道”或“理”这个词汇来表达唯

心主义，便要白沙来代受其过，这恐怕是“天理人情”所不允許的罢。

李錦全、陈玉森二同志說：道比天地大，將何所寄？我們說：寄在牛寄在馬身上寄在万物万事身上。因为以單一的天或地來說，它是和牛或馬同數的。“天地”在中国字的含义，并不代表万事万物，否則，我們习惯见到的“天地君亲师神位”，就可以不写“君亲师”了。习惯上指天地，只是指“上复下截”的这两个东西而已。如果說天地就是把万物都指在內的，正如指人是包括人的头发和手脚在內一样。那是不可以这样类比的，因为人的头发、手脚和人是一个整体，砍去人的手脚，人便是一个残废人，正如把太平洋和亞洲或欧洲凿去，就不能称完井的地球一样。至于人和牛馬等万物是寄居在天地中，如虱在人在身上。如果指人就連虱也包括在內，那是沒有这个道理的。

問：沒有天地之前，道將何所寄？答曰：如前如述，沒有天地之前，道寄在渾淪之中，寄在星云之中。問：道寄在万物之中，應該也寄在火中，火熄灭了，道寄到那里去？答曰：道寄在“能”中。

二、“道”“心”关系

白沙哲学的“道”“心”关系，其实就是人的主观与客观事物的关系。白沙从来没有象陆象山那样說过：“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在“次韵送藤枕”一首詩里說：“万事无心一片云”，他的所謂“心”，只是人才有的。而且，“吾聞用世心，中外无异等”（贈閩督府还升南京秋官），人人都有一颗心，沒有差別，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这颗心，在他的哲学思想里，他把“它”放在怎样一个位置上呢。我們且看看下面的詩句：

“圣学信匪难，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养，庶免物欲戕。”（白沙子全集卷五，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

“学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实，立本貴自然，戒慎与恐惧，斯言未云偏。”（白沙子全集卷五，答张内翰廷祥書括而成詩呈胡希仁提学）

这两首詩是白沙的得道之作。前一首會使他“名动京师”；后首也是为門弟子所服膺的。根据上述的几首詩，有一两点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心不是道，不是天地万物，也不就是圣学。心只是求道、求圣学的一个生理器官，換句现代的話說，只是一个腦子而已。

第二、心不能从先天帶來什么道、什么圣学，

而是要用心，要專心，才能得“道”得圣学。善端不好好培养，不戒慎恐惧，道和学或圣学仍然求不到。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反映論嗎”？白沙在“藤簷”一詩里說：

“千卷万卷書，全功归在我，吾心內自得，糟粕安用那。”（白沙子全集卷五）

所謂“自得”，对“心”來說，它起能起作用；但对“道”对書來說，它只是被动的。他在另一处地方解释这种“自得”是这样：“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誦信予夺之間哉”（白沙子全集卷一、李文溪文集序）。“自得”之前还是要“功深力到”。“自得”之后，也不是連天地、死生都沒有了，不过是“不知”。这“不知”即“乐以忘忧”之意。

白沙在詩里常把这种“自得”解成“乐道”。

“自得”，是他“乐道”的一种境界，也可以解释为“道”与“心”或“理”与“心”的一种“湊泊吻合处”。他在“感事漫述与王乐用”一詩中說：

“士而未聞道，未免为物挠。卓哉安心人，外事若无好”（白沙子全集卷五）

“天地列两仪，其中位太极，不悟名象生，焉知画前易”（白沙子全集卷五，湖西八景，为罗修撰作，太极丸春）

后面引的这詩是說思想的源头是名象，否則“八卦”也悟不出来。前引的詩，說的是“士”要聞“道”才能不为物欲所挠，才能安心；只有能安心的人，才不会为外事的紛扰所动。这說明“心”与“道”不仅是两件事，更重要的是說明了他的“道”是第一性，“心”是第二性，“道”是主动，“心”是被动；“道”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心”是反映客观存在的。

正因为白沙把“道”放在第一性，把“心”放在第二性的位置上，所以他在詩中有时簡直把“心”看成一件普通的器具一样在运用“心”去認識“道”。如“和刘柴桑寄袁道见怀一峰之意”一詩中說：

“磨劍患不快，快則随所須，永愿磨此心，恢恢快劍如”（白沙子全集卷五）

但“心”这个东西还有它的主观能动作用。从人的生理作用來說，它不过是一个思維器官，从“心”与“道”的关系來說，它又是能“受道”，“得道”甚至能“乐道”的。在“贈世卿”一詩中，白沙对此有很好的說明。

“可以參兩間，可以垂万世，圣人与人同，圣

人与入异。”

所謂“同”者，同是這一個腦子；所謂異者，聖人能發揮他的腦子的作用，於是能參天地之化育，垂萬世以令名。怎樣才能與人異呢？白沙是覺得要認識宇宙萬物，必須用心觀察不為主觀成見也要不為宇宙萬物的表面現象所蔽，心要在萬事萬物之上，透過萬事萬物的表面現象去求它的本質。在“隨筆”一詩里，他這樣說：

“斷除嗜欲想，永撤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上”（白沙子全集卷五）

身在萬物中，這是聖人與人同的；心在萬物上，這是聖人與人異的。異者，在運用此心不同而已。因此，在“示黃昊”一詩里，白沙索性把心當作一個把柄，他說：

“高明之至，無物不復，反求諸身，把柄在手”（白沙子全集卷八）。

但是，縱使白沙如何重視這顆心，終於在任何時候，他還是不把“心”脫離這個“身”。他辯証地了解到心為形役，身為心役的關係。在“送李世卿還嘉魚”一詩中，他更形象地說到這一點，他說：

“疾風起驚濤，舟以柁為命。柁乎苟不操，舟也何由靜？是舟如我身，孰知身之棄，是柁如我心，孰祛心之病。不如棄其身，免與風濤競。”（白沙子全集卷九）

柁固然能使舟向東向西，決定舟的去向，但棄了舟，柁也就失掉作用了。

事情擺得很明白，白沙的道是天地萬物之本，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得之為人。人只是在萬物中，而心在人的心中，正如柁在舟中一樣。不過，因為心是有主觀作用的，所在心在萬物上。這個心能起了不起的作用，它可以是我們“得道”的把柄。但它又沒有什麼了不起，它如劍如柁。劍沒有人用它，雖快無用。沒有舟的柁，也不能與風濤競。至此，我們可以下結論說：道心關係，只是存在與思維的關係，“道”是第一性，“心”是第二性，因此我們不能說白沙的哲學思想是唯心論的。

三、怎樣得“道”？

上面我們已經將白沙的本體論、認識論的問題初步闡明了。剩下的問題是白沙怎樣去得道，他是重內省還是重實踐呢？章沛同志說：白沙是由涵養而得道的，李錦全、陳玉森二同志說，這種涵養是一種內省功夫。

李錦全、陳玉森二同志舉出四個材料證明白沙

的涵養功夫是完全不靠外物的，這四個材料在李錦全、陳玉森二同志認為是有力的。的確，外人看起來是駁倒了章沛同志。我現在先將這四個材料為綱，逐條注釋，然後以白沙的詩來証實，請白沙自己出來做評判員，當可說出一個道理來。

材料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于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即得之矣。非得之書者也，得自我者也。”（道學卷序）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求學的人不應該專門依靠書本，重要的是要自己善于用心學習。觀察事物的一動一靜一消一長之“機”（這個“機”，可以當“規律”解，可以當“關鍵”解），加強自我修養，不要為聞見上的事物表面現象所迷亂。耳目的支離破碎之用是不好的，要去掉，常常保持虛圓而變化不測的精神，這樣打開書看對於書中的東西就一覽無餘地知道而有心得了。能夠做到這樣而有心得，不是靠讀書從書里得來，而主要決定於自己，即“得自我者也”。

白沙這段話明明是講學習方法的。在“題梁先生芸閣”一詩里証實了他的本意，他說：

“世人聞見多尚博，恨不堆書等山岳……讀書不為章句縛，千卷萬卷皆糟粕……”（白沙子全集卷八）

對於那些以為多讀書就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白沙是看不起；特別是對於那些坐擁書城的“記問之學”者。因為書有好書，有不好的書，對好書尚且有“會讀”與“不會讀”之分；對於不好的書，讀得多，多到汗牛充棟，又有何用？在和陶十二首中的“贈羊長史寄遼東賀黃門欽”一詩里，對於這一點講得更明白：

“此心自太古，何必唐生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白沙子全集卷五）

他不是反對讀書，只是覺得“明道”不一定要多讀書。

材料二：“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贈彭惠安別言）

白沙在這裡絲毫也沒有否定耳目聞的作用，只教人不為所累而已。他說的是人在得道之後才能不累於外物，不累……。並不是說有道的人連外物都沒有了，造次顛沛也不會有了。所謂“其機在我”，也不過是要人有操持。“鳶飛魚躍”，是他形容有操持即有“道”的人的心理自得境界和“鳶

飞鱼跃”那样自然、纯真合乎客观规律。

在“赠世卿”一诗里，他是这样解释“不累”的，他说：

“进亦人所爱；退亦人所忧。得亦人所忧；失亦人所忧。所忧非忧道，所忧其可留？所忧非忧贫，所忧其可休。古来向道人，能辨忧所由。去去凌九霄，行行戒深沟。敬此谓之修，息此谓之流。”（白沙子全集卷五）

在“送李世卿还嘉鱼”一诗里，他说：

“富贵何慢慢，贫贱何戚戚，一为利所驱，至死不得息。夫君生超此，俗眼多未识，勿以圣自居，昭昭谨形迹”（白沙子全集卷九）

他的意思是要人“不累”，是谁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不累”当然是好得很，在陈白沙所处的那样的社会里。能够“不累”，当然是修养工夫深。难道一个不为声色货利所动，专心致力于求真理的人，就说这个人是唯心论者吗？这样，只有那些患得患失，一遇小波折就动摇心志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最唯物论者了。中外古今，有这样的唯物论的哲学家吗。

材料三：“使心常在，见到理明后，自然成就得大”（书漫笔后）。

心常在才能见到理明，这个“心”，只是要人莫胡思乱想，为声色货利所诱，为造次颠沛所累，只是要人莫身在山林心存巍闕；只是要人集中精神去细察物理。在见未到理未明的时候，只有这样做才能成就得大。谁如果反对他这样做，谁就是一个唯心论者。

在“读近思录”的第二首里白沙说明了“心常在”的情形是怎样的，诗云：

“六经不假群贤补，却忆宣尼下手时，白首斋心颜子坐，青灯横几大临诗”（白沙子全集卷九）

“心常在心”，即是“斋心”，白沙的成就得大，正是因为他肯白首斋心，和与颜渊那样的“坐忘”，不是上帝赐与他的。他在“再用韵示诸生”一诗里说：

“贤圣低回久，千年想一临。希颜非乐道，疑孟失求心。逸驾行应速，寒泉汲务深。常闻根本学，不尽泰山岑”（白沙子全集卷七）

为见事明理，即使如颜子那样坐忘，孟子那样求放心，这样的“根本学”，是不会影响他的本体论，使他变为唯心主义者的，因为他的心在内，是为了“见”为了“明”，外面还有个要见的和要明

的东西在那里。

材料四：“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除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书自题大塘诗屋诗后）。

这里是要人求学要有个主观判断。“徇外自欺”，只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之意，并没有劝人不读紧要文字。即使他自己说这是“心学”，只是要人唯精唯一，允执厥中之意，不等于是唯心之学，因为他明明白白地是指求学而且是专指从书本求学说的。最后让我在这里再引诗为证。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与子何有焉”（白沙子全集卷五，赠陈乘常）。

白沙在这里提醒陈乘常不要人云亦云，自己要有个判断。白沙没有将一个唯心的秘密武器给陈乘常。白沙自己说的话要陈乘常不要盲目附和，可见白沙平日并没有把自己的话当作金科玉振，从而可以想见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心所想到的道理一棒一石一件件符合客观事物的道理。对于自己认为对的，尚且要别人判断判断一下，对于书上的东西，要别人判断判断一下，有何不可。

总之，白沙要人求诸心，使心常在，不为书本影响，那是做为一种求学的方法提出来的，不是他在扩大“心”的作用，说有了心连人和地球也不存在了，因此，我们不能说他是唯心论者。他说道可“心得而存之”是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使他说不出“道”是什么东西，只能叫人心领神会。他要人用心，只是叫人开动脑筋去想，请不要误会这个“心”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唯心主义”的“心”。

至于白沙得“道”是怎样从静坐中去得呢？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了，只引几句诗为证，以结束本文。诗云：

“病叟山中观物坐。”（白沙子全集卷七，丁县尹惠米时朝覲初归）

这里他是坐在观物，不是在坐禅。又诗云：

“端坐思古人，寒灯吹悠悠。”（白沙子全集卷五，冬夜）

这是坐在“思”，没有打瞌睡。

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阶级斗争，没有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的幸运能够地参加生产劳动，但既“观”又“思”，谁又能否认他没有借助于感觉和理性去认识“道”呢？



广东新軍的“庚戌起义”

王在民

一

清末光緒三十年（1904年），滿洲皇族为了要巩固垂危的封建統治权力，將全国新軍整編为常备陸軍，編成三十六鎮，北京設練兵处，各省設督練公所，企图借新軍兵力，把八旗綠营、巡防营等竊取腐化的旧軍裁汰，重新建立武裝力量，鎮压国内革命。

这一时期，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和墮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本質，已經明显地暴露在人民面前。人民再也不能繼續容忍清廷的残暴統治，因而推翻清廷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使中国革命的形势，有了順利的发展。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总结了1895年广州起义，1910年惠州起义諸役失败的經驗。他一方面，团結着全国会党的組織，同时把出现在許多大城市中帶着自觉革命性象光复会、华兴会、日知会等传播革命的“新学”团体，都集中起来于1905年在日本組織中华革命同盟会；另一方面，他与改良主义派断絕关系，战胜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的反动謬論，翻然改变为反清的革命立场，提出“驅除韃虜，恢复中华”的口号。提出了較有体系的革命理論“三民主义”。經過同盟会的組織和发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党人的思想和觉悟程度更有所提高，但是孙中山还对国内广大群众的力量認識不足，沒有广泛的动員，只孤立地分头进行着武裝起义的軍事冒险，而清政府的改建新軍，恰好正为武裝起义創造了宣传活动的对象。

二

广东开始編練新軍，原定計劃編常备新軍两个鎮，最先成立一个鎮，挑选原有的巡防营精壯士兵改

編，分为第一、二、三共三个标。初任新軍第一标的标統是赵声，协統是张培梅。赵声字伯先，江苏人，是一位爱国的革命志士（至1909年正式加入同盟会），在江南陸軍学堂毕业后，即在南京当陸軍統領，因傾向革命，被两江总督端方疑忌去职。后来，两广总督张人駿慕其才，聘他来广东任两广督練公所提調。新軍成立后，他被調任为标統。

新軍第一标駐扎在燕塘，第二、三两标駐扎在北較场。第一标的編制有步兵三营，炮兵二营，輜重兵和工程兵各一营，每营約有三百余人。步兵三营是共駐在一处地方，作品字形。炮、工、輜則另駐一处，彼此相离不远。各营之中，上級軍官多是广东陸軍速成学堂和虎門講武堂的毕业学生，营中除設管帶（营長）以及隊長（連長）、排長之外，还設有见习官多人，以便临时听候差遣。庚戌起义的领导人倪映典就是充当炮兵营的见习官。

倪映典的姓名原是倪端，字炳章，安徽合肥人，是安徽武备練軍学堂的毕业生，在安徽騎兵营当管帶，因在軍中与同学熊成基进行反清革命組織，被端方电令安徽巡撫朱家宝查办，遂离安徽来广东活动。他来广东之前，在香港加入同盟会，負責組織革命，特投入广东新軍充当下級軍官，企图容易着手聯絡士兵。

1907年8月，欽州三那（那黎、那彭、那思）地方种蔗的农民被抽剝糖捐过重，无力担負，举代表来广州請愿减免，粵中大吏誣指为抗捐，反將代表数十人囚押起来，引起欽州人民起义反抗，称为“万人会”。其时孙中山正在越南河内計劃攻取滇桂粵，听到这消息，派人和欽州起义領袖刘思裕联系，帮助起义人民占領了防城，正謀大举。粵中大吏調集两广大量的兵力前往鎮压，广东方面，派出巡防营二营由統領郭人漳率領攻欽州，新軍一营由标統赵声率領攻廉州，对起义軍作大包围，准备大

屠杀。孙中山认为郭人漳与赵声同是革命党人，约会他们与起义人民联络大举发难，欲占领钦廉一带作革命根据地。怎知郭人漳是一个投机分子，畏惧清朝势力，中途变计，反向人民起义军袭击，遂致刘恩裕牺牲，起义军被迫退入十万大山中，给清兵渐次消灭了。

赵声自从经过这一役之后，更遭到两广督练公所疑忌监视。有一次，督练公所派军法官将緝获逃兵，特地解到新军第一标公审示威。这些军法官，头戴翎顶，穿着军机小褂，摆设公案开庭，审讯逃兵，在营大逞威风，赵声被激得异常愤怒，把他们的公案推翻，军法官驱逐。督练公所虽对赵声愤怒，然不作正面的报复，暗中施行调虎离山之计，改调赵声为陆军小学监督（即校长）以泄恨。这时期，清吏对赵声发生严重的猜忌，使他很难安于其位。

1908年冬，清光绪皇帝载湫和慈禧太后那拉氏先后逝世（光绪于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死；那拉氏于十月二十二日死）清朝称为“国丧”，下令官民辍乐止讌，而军中则无论官兵都不许离营外宿，执行得很严厉。独有一标不遵守，唱歌外出如常，督练公所忌恨非常，多方设计把赵声赶走。赵声不能在广州立足，离粤往港，将新军革命推进的任务，交给倪映典负责。

三

新军内部设有卫兵司令室，每日的值日官，规定以排长当正司令官，见习官当副司令官，对于上级长官出入营门，必须列队吹号致礼，上午是由正司令官负责，下午是由副司令官负责。有新任管带王体端，在接任的第三日，下午回营，恰好是倪映典值日，而倪适因腹痛上厕，没有参加列队。王提倪责问，倪因申辩触王之怒，被打四十军棍撤职，立刻要驱逐出营。被逐的时候，正是下午六时后，已受伤不能走动，又是外省人，无家可归。队长为他讨情，暂时留营休养，不准，最后迫得由各同事资助，雇了一乘小轿，把他送到附近的华宁里一家小客栈住下，延医调治。

倪映典被撤职，表面上与新军脱离关系，实际上未间断往来，而且越形亲密。新军中的知识分子，对当前腐败黑暗政治感到极度的失望，思想正求出路，倪映典把握时机，每于休假之日，暗中招集军中的同志相聚于广州东较场的野外，秘密串联。倪映典是住在白云山的能仁寺中，能仁寺的演非和

尚收留他。他又认识一个同乡叫“汪彖斌”，汪彖斌是李鸿章为粤督时的淮军排长，也是安徽人，流落广州失业，倪用他为革命助手，往来于城内的革命机关，传递消息，而倪本人则往来于香港与同盟会联络。又有水师提督的巡防营第三营管带董常标，他也是安徽人，假借同乡之谊，结识倪映典，作清政府的特务，向倪探听革命消息。倪进行革命工作，董常促他早日起义，诈称自己愿意统率队伍参加打头阵，并答应供给子弹，而暗中却把革命的实情，向水师提督李准告密。

四

1909年是清宣统元年，广州在东较场开体育运动会，军警与学生都参加，新军初欲在运动会开幕时起义，约定起义时，有枪的举枪，无枪的拍胸口（胸膛），作为暗号。李准得董常标的密报，于运动会开幕时，命令东较场一带戒严，防范极密。倪等见清兵戒备，知难着手，不敢轻动，临时改期，然仍不知其中有人泄漏消息。运动会结束后，督练公所施行毒计，忽然下令新军作夹弹射击的演习，天天操练，演习将近二月，新军的子弹至是已被消耗干净。

两广督练公所又迭接惠州陆路提督秦炳直电报新军阴谋革命，新近又破获革命党葛谦、谭馥等运动巡营之案，因此对新军猜疑日甚，防范更严。这时倪映典认为起义已到酝酿成熟时期，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是年的除夕，适有二标三营的新军吴英元，到双门底（即今永汉北路）绣文斋印名片，发生争执，吴英元不服巡警的干涉，被带回警署，在途中得遇其他新军救援，互相殴斗，又被捉回警署拘禁。二标派人来保释，给警署拒绝，引起新军大众的愤怒，遂发生兵警大闹禹山关帝庙巡警署之事，成为起义的革命导火线。

翌日，庚戌（1910年，宣统二年。）元旦，新军一标不甘警署的侮辱，图谋报复，乘元旦放假的空闲，结合了数百人，怀备器械，拥到禹山擒回被拘的兵士，将警署拆毁。

两广总督袁树勋闻变，调集广州协镇、水师提督、巡警道及广州首府、南海、番禺两县等兵力守城，紧闭各城城门坚守，异常惊恐。初二日，督练公所采取镇压手段，突然宣布不放假，不准外出。旧例，元月元旦例有春假三天，忽被取消，群情鼓噪。协统张哲培、标统刘雨霖假借新年团聚为名，

召集全体官兵八千多人在燕塘訓話。訓話时，声色激厉，忽然牽涉到革命方面，胁迫部下要交出“保亞票”（即同盟会会証），如有人收藏，搜出了定必斬头等語。全軍对他的話异常愤怒，散会后議論紛紛。这一天，倪映典适由香港回来不久，得到新軍嘩变消息，料清吏必有行动，他假扮馬伕，率馬在营前偵察，听聞强迫要交出“保亞票”的話，感到无法再能忍耐，又适值第一炮兵营管帶漆汝汉出来，把他驅逐。他忍无可忍，便立刻从怀中拔出手枪向漆汝汉轟击。漆汝汉中枪，跑至司令部前倒斃。张哲培开会正入到办公室，聞枪大惊，慌忙騎馬从协部后門奔出，由間道走天字馬头水师行台向水师提督李准求救。

漆汝汉被击斃后，燕塘新軍一时混乱，倪映典向大众宣布起义，大呼“如有不服从革命的以漆汝汉为例”，并提議推举指揮官。这时人声汹涌，紛紛对革命表示态度，立时举倪映典为指揮官，愿意服从命令。倪馬上传令集队，先行据守沙河的息鞭亭和小旗亭两据点。一面又派出一队向北較场前进，占据錢局（今黄华路）后山的小山和橫枝崗一带。一队向东較场进发，占据茶亭各处。并且分头向糧重营、工程营搜集枪炮，誰知所搜出来的枪炮，多是空枪空炮，所有扳机和子弹已于二十九日被清吏暗中运走了，只有在协部內搜到子弹几箱可用。

初三日清晨，倪映典率領起义的攻城大队，浩浩蕩蕩由沙河向大东門进军，欲乘势占领省城。当时有人顾虑子弹短少，倪因誤信童常标的謊言，仍以不足为虑向大众回答，說只要达到大东門諮議局（因童成标所部的亲軍是駐在諮議局近旁的講武堂內）即有大量补充。同时，他又以为事前已約定虎門和黄埔两地陸軍学堂的学生，以及河南大塘村土匪李福林等接应，故瀟信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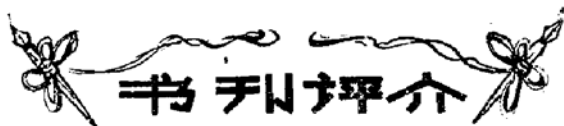
初时新軍起义的消息传入广州的时候，两广督練公所企图和緩革命？以黃埔陸軍小学总办黃士龙曾为新軍一标标統，对新軍感情不坏，曾命黃馳赴

燕塘镇压。广州城內的滿清文武官吏异常震恐，將城門关闭，四面調集水陆兵力增援。黃士龙奉命至东郊游說，反給起义軍斥为反革命，失意回城复命，駐守东門的旗兵不肯開門放入，反被开枪射击，击伤大腿，同行的副目张輔云被击斃。

起义軍大队行至牛王庙，远见四山滿布清兵，很觉惶惑，主张冲鋒前进，倪独惑于童常标之伪約，認这是童兵来接应，命令队伍暫守山前，自己却單騎前进。倪映典走至东明寺（今史坚如祠），果然遇见童常标，童仍騙倪是来作先鋒，叫倪帶队进城。其实这时李准得张哲培报告，早已做好布防，仅由童常标来誘敌罢了，倪不怀疑，回头仍帶队前进。童常标等兵已分扼要隘，用十二挺新式馬克沁机枪，集中火力，向东明寺一带扫射，起义軍前队三百余人当场壯烈牺牲，后队新軍奋勇接战，終因子弹缺乏，被清兵四面包围，无路可退，成为俘虏。起义領袖倪映典受伤被擒，李准对他怀恨，絕不問話即加杀害，由凶手刁紹标用指揮刀斬了九刀，与其他同志王占魁、胡常松、危宗源、汪象斌諸人同时牺牲。

反革命集团李准吳宗禹等以“平乱”有功，由总督袁树勛奏請清朝主子，賞李准穿黃馬褂，吳宗禹得巴图魯号外的封賜。其他若童常标等大小官員都一律升獎，随着对广东人民愈加放肆迫害。只有张哲培倒霉，以事前既疏于防范，事后又以处置不当的罪名，发往軍台效力。

革命的火焰給反革命暂时扑灭，督練公所派提調李三才，委員朱为潮会审俘虏，异常苛毒，把在近郊捕获的逃軍，不問情由，都在东門的三株树斬首示众。更派講武堂提調张培基再行編配新軍，拟將原来新兵遣送回籍，后因新軍知道回原籍一样是受本籍官紳的压迫，抗令不行。直到第二年秋季广东第二次招兵，新軍又完全改換姓名，应募入伍，重新作革命的种子，終于在辛亥武汉革命胜利来临之日，在广东起义响应。



——介紹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文集

屈 辛

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开始革命活动到生命終結，从来沒有間断过同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地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長和巩固起来的。自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机会主义又发展成为修正主义。于是列宁繼承了这一斗争的任务，他在击潰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方面，作了卓絕的貢獻。并在各种斗争中发展了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

修正主义是資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思想意識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现。所以反对修正主义，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綫的斗争，是无产階級思潮与資产階級思潮的斗争。目前，由于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极大恐惧；他們除了动員一切可以动員的力量从正面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疯狂的攻击之外，并且利用革命队伍中某些机会主义分子从内部来破坏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抬头的客观原因。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抬头，因此，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当世界各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保証共产主义原理的彻底胜利时，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文集的出版，为我們的斗争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

編入本文集的著作，是列宁在各个革命阶段中为反对国际工人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写的。这些著作虽然是在35年前至60年前写的，但是，从他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批判中，我們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影子。同时，我們还从中看到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耍的花样，其实都是当年为列宁所批駁得体无完肤的貨色。

修正主义产生于19世紀末，在德国有伯恩施坦

主义、考茨基主义，在俄国有合法馬克思主义、經济主义和孟什維克主义等，在英国有关費边主义，在法国則有內閣主义者。列宁指出，修正主义的出現，决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錯誤，也决不是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所造成的；修正主义是国际現象。列宁說：“現時（这在现今已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費边派，法国的內閣主义者，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評派，都是一家兄弟，彼此称扬，彼此学习，共同攻打‘教条式的’馬克思主义”。（文集第13頁）从列宁对当年的修正主义的描画中，我們不是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咀臉嗎？现代修正主义不是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大喊什么打倒“斯大林主义”、“保守主义”嗎？最近更提出什么反对“实用主义的修正主义”了。看起来，好象他們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他們也的确曾經这样自詡过是“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可是，他們要打倒的所謂“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修正主义”，正是革命导师們所創造性地发展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

談到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时，列宁指出是在于資本主义社会的經济制度本身。所以，修正主义是資产階級思想体系反对革命思想的斗争在表面承認馬克思主义这一基础上的繼續。这是因为“馬克思主义在理論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換上一套馬克思主义的衣衫。內脏腐朽了的自由派，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文集第110—111頁）

在理論方面，修正主义者一开始就以系統的机会主义观点同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相对立，希图用改良主义来偷換馬克思主义。列宁認為，用改良主义来偷換馬克思主义，把革命政党变成为改良主义政党的企图，等于政治上的自杀。所以，他同俄国的机会主义——“合法馬克思主义”、“經济主义”、孟什維克主义和它的变种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革命的理論，使它不致被歪曲和

糟蹋。同时，他对第二国际的叛徒們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直至第二国际完全破产为止。

上面說过，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就进行了的。在“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伯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等人致左尔格等人書信集俄譯本序言”、“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文中，列宁把馬克思恩格斯同唯心主义者，同庸俗經濟派、普魯东派、布朗基派、拉薩尔派，以及德法英等国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作了簡要的叙述。

列宁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追述了他自己同俄国“馬克思批評家”即“合法馬克思主义者”作斗争的经过。对于修正主义的本質，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司徒盧威主义不仅是俄国而且也是国际的資產階級理論家的一种意图……采取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階級斗争（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直到‘一般地’承認‘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認資本主义要被‘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馬克思的活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文集第204頁）

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的理論，是修正主义的特点之一。所以，他們宣扬“階級和平”，鼓吹“階級合作”、“資本主义和平長入社会主义”，象考茨基就是喜欢談什么“純粹民主”，贊揚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他認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斗争任务只能是争取“国家政权內部势力对比的相当变动”。这些背叛革命、背叛社会主义的謬論，早就給列宁駁得体无完肤了。比方民主問題列宁就指出，說：“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維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文集第360頁）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旧的修正主义一样，也說什么資本主义可以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他們也提出什么只要对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不断施加压力”，争取在这种国家机器中“起决定性的影响”，就可以“保証社会主义的发展”。宣扬这种謬論，目的无非想反对階級斗争，取消無產階級革命。

上面說过，自由資產階級可能接受階級斗争，因而修正主义有时也会承認階級斗争。但是，作为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却是修正主义者所堅決反对的。所以，列宁特別指出：“只有承認階級斗争，同时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1938年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399頁）列宁認為工人階級

为了鎮压剝削階級不可避免的反抗，必須建立自己的專政，把全体劳动者团結在自己的周圍。这是列宁对馬克思主义革命理論的发展。但是，现代修正主义仍然唱着他們前輩的老調，如考茨基的兒子別涅狄克特·考茨基在評述奧地利社会党的新綱領草案時說：新綱領沒有“关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有害的詞句”，“任何形式任何名称的專政都應該加以拒絕。”与此同时，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千方百計地稱贊資產階級民主是所謂“純粹的民主”，其实这种所謂民主，不过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別名而已。可見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旧的修正主义者一样，借拥护民主之名来反对無產階級專政，維護資產階級專政。

在国家問題上，列宁对考茨基等作了严重的斗争。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过程中，必須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工人階級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国家去替代資產階級專政的国家，这是馬克思主义理論中的重要原理，而考茨基等对这一原理却作了机会主义的歪曲。如考茨基認為沒有必要打破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也无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对于这些問題他是采取非常狡猾的态度的，他为了避免正面回答这些問題，他說这个問題可以“留到將來”解决。他用未来国家形式不可能預見来掩飾自己的机会主义面目。实际上他是迷信与崇拜資產階級官僚主义国家的，所以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就开始反对俄国的無產階級專政，于是他那机会主义面目再也无法掩飾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叛徒考茨基”中，对考茨基等对馬克思主义国家學說的歪曲和考茨基歪曲馬克思关于国家、关于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这一叛徒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在这一問題上也繼承了他們前輩的衣鉢，否認“国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这一馬克思主义原理，极力粉飾和美化資本主义，竟說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差不多。他們認為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国家日益監督資本”，“限制資本”，“国家調节者的作用得到加强”，他們將資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資本主义美化成“社会主义因素”。他們散播这些謬論，无非想得出：資本主义能够和平長入社会主义的結論。这样一来，社会主义革命論就給取消了。所以，与此同时，他們都对無產階級国家进行百般的污蔑与丑化，并且在目前国际資產階級对社会主义进行无孔不入的破坏活动的情况下，竟謊謬地把国家消亡当作现实的任务。馬克思主义者是主張国家消亡論的，但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消亡。列宁写道：“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

但他們認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階級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成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文集第335頁）现在，社会主义虽然已經不再是資本主义包围中的孤島，而成为一个世界体系了。但是，帝国主义反动派还是存在，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就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反动势力残余也还未完全肃清，在这种形势下面要求国家消亡，这岂不是要工人階級放弃已取得的胜利、放弃已掌握在手中的政权，去听任资产階級的宰割嗎？

在党的領導作用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問題上，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旧的修正主义也是唱着同一謊謬論調的。他們反对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領導作用，他們不承認共产党是工人階級的最高級組織形式。他們認為被工人貴族所把持或站在保持資本主义制度立場上的工会、如美国的工会也能領導工人实现社会主义，認為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只能是“思想因素”，而不能是“政治因素”、“政权因素”。这只是說明修正主义者为了討好资产階級，他們企图建立不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不能組織人民群眾爭取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政党、机会主义政党，他們是力图把工人階級的战斗的、革命的政治組織变成辯論不休的俱乐部一样的团体。其实，修正主义者的这些謊論及其企图，列宁在同俄国“經濟主义”和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时，就已經給予严重的駁斥与揭露了的。列宁对这一問題所作的斗争，他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有了詳細的叙述。

列宁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著作，也占了文集的大量篇幅，在这些著作中，列宁揭穿了第二国际首領們的投靠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面目，指出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同謀，指出他們利用詭辯竭力把“帝国主义的、爭夺殖民地、掠夺性的战争描繪成人民的、自卫的战争”，并且“从历史上找出非帝国主义战争的实例来圓說”。（文集第194頁）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高叫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时”了，用“民族共产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強調民族特点，否認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共同的特点和规律性。他們把社会主义国家間的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和密切合作的兄弟般的关系，降低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互为睦鄰和商业互惠的和平共处关系。他們竟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團結一致說成是某个大党的“思想壟断”、“政治霸权”等等。我們不知道他

們的这种謊論和帝国主义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陣营的誹謗、中伤的言論有多少分別；他們的这种謊論只能破坏工人階級的国际團結，分裂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瓦解社会主义陣营，因此，帝国主义就会把他們引为知己。

列宁为了彻底粉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观点，对它們的社会根源、階級根源和認識根源均作了精辟的分析。列宁在“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及其他著作中对哲学、政治經濟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批判，对我們今天所进行的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哲学、政治經濟学观点的斗争有很大的帮助。

列宁起草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两个决議，反映了1920年—1921年間在苏維埃国家轉入和平經濟建設的时候，列宁同苏联共产党內各反党集团的斗争。当时托洛茨基分子硬要党对群众采取粗暴强迫的政策。“工人反对派”分子則要求把国家手中的国民經济管理权交到“生产者”手中。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反复地強調什么“工人委员会”的作用，說什么讓直接生产者“自行决定有关产品的生产和总分配問題”。关于这一点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們又是多么的相象！

。上面說过，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两条战綫的斗争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所以，收入本文集的列宁著作，不仅反对修正主义，而且也反对教条主义。因为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孿生兄弟。实际上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常常結合在一起。比方俄国的孟什維克和第二国际首領們这些机会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列宁就曾給予尖銳的批評。他們說什么俄国生产力的发展似乎还没有达到足以建立社会主义的高度，俄国还不够文明，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列宁批駁他們說：“你們說，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們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創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国資本家，然后走向社会主义呢？”（文集第517頁）教条主义的特点是脱离实际，脱离生活，它是束縛人們思想的东西，我們只有克服了教条主义，解放了思想，才能更好地駁倒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特点是強調个别和特殊，否定一般，否定一切，我們只有駁倒了修正主义，才不致迷失方向。现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正在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为了进一步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說，我們必須学习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經驗，使这一斗争取得彻底的胜利！

1938年8月



迷信种种 介 文

在高等学校最近热烈展开的教学改革运动中，发现部分教工同学中存在有形形色色的迷信。这些迷信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严重妨碍着科学文教事业中马克思列宁主义阵地的建立与巩固。

其中最突出的是迷信资产阶级专家。某些资产阶级专家被奉为打不破的金字招牌，他们的著作那怕片言只字都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关于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教授的传说，在系与系之间、或校与校之间，慢慢流传起来，把这些教授们说成高不可攀的天才。流弊所至，在广东省竟有极少数高中学生，到处打听某某老教授究竟懂得那些国家的文字，决心要以老教授的方向为方向，羡慕他不用马克思主义也能得到人们的尊重，以有朝得列其门墙为幸。这说明了，对资产阶级专家的盲目崇拜，已经侵蚀到了若干年青学生的思想，引诱他们脱离又红又专的道路。而在这类的迷信捧场下，被迷信的资产阶级专家也就一天天更加自高自大，置身于群众之上，故步自封，因此多年来思想进步很慢或竟没有任何进步。

迷信资产阶级专家往往是厚古薄今思想的一项表现。有人妄想托庇在他们这些“大树”底下，为自己安排一个马克思主义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脱离现实的斗争。有一个关于某资产阶级专家的传说，最可说明这种心理。据说这个专家害了病，斯大林和英国女王都非常关心他，拍电报到北京来询问他的健康。这一个荒谬不经的故事后面，隐藏着什么思想呢？就是“学术无国界”“学术性和政治性分离”的思想。在说这个故事的人为资产阶级专家抬高声价，同时也就是想为一切“大知识分子”抬高声价：“只要有真实本事，共产党也好，帝国主义者也好，都不得不一样尊敬我们！”对于这些先生，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你们错了！”你们如果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真意和工农结合，那你们的“真实本事”才可以成为国家宝贵的财产，否则只算一个半知识分子而已，而对半知识分子，我们是不能给予尊敬的。所以，能否得到人民的尊重爱护，关键在于自己是否下定改造的决心。

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往往又和迷信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联结在一起。许多资产阶级专家都留过外国，受到资本主义国家中代表垄断资本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他们自己因此就常常重外轻中，販

卖民族自卑感。例如有些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老先生，却受到实用主义的毒害，把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制度、伟大的科学发明，往往认为是外国传来的，数典忘祖，抹杀了中国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能力。他们所以发生错误，原因就在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些错误本来是不难看出的。可是却有不少人震于老先生的盛名，就随声附和。本来是对资产阶级专家莫测高深的，既然看到他留过洋，得到外国学者的称许，有了国际学术水平，他所讲的一切恐怕不会错吧？这样，资产阶级专家们本身就是重外轻中，宣传迷信，而别人又从而迷信之，谬种流传，岂不要误人子弟呢？

有些人从迷信资产阶级专家而归结到迷信自己。在教学改革中，部分教师摆出老子天下第一的神气，对群众大字报提出的意见不瞅不睬。他的法宝就是：“我这一套是出自名师的，那还错得了？”这样有几个人互相标榜，仿佛就只有他们懂得这门学问，旁人讲的都是狗屁。过去学历史的人有所谓“先师派”，一开口就是“先师王静安先生”，以死人的招牌来自文其浅陋。在今天知识分子自觉思想革命中，以这一手来进行抗拒的，还大不乏人哩！

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必须破除这些种种迷信，不盲目附和资产阶级学者，才能得到思想上的完全解放。过去我们在科学文教事业上，由于不恰当地信任了资产阶级专家而使工作受到损失，吃了资产阶级学者的亏，是不不少的，今后必须引以为戒。知识分子要能够更有效地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首要的也是必须破除迷信，不要绝对地迷信大师，不要被资本主义文明所俘虏，不要迷信自己。资产阶级专家诚然是读了很多的书，掌握了很多资料，但是他们在实际斗争中的知识往往是很有局限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是不愿意学习，或者是学习得不好，运用得不好。对于他们，我们一方面不作过分的要求，可以学习他们的某些长处，另一方面还必须帮助他们进步，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接受党的政治思想领导。我们绝不应该把他们看成学问的高峰，更不应该推波助澜，在广大的青年学生中散布对他们的迷信。至于乘机攀附，希望“水涨船高”，借大师的声名来逃避思想改造，那更是害己害人的勾当，一切高等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必须检查，克服这一种有害的思想，肃清迷信对我们思想的影响。

“博学”与“堆积材料”

河 山

在学术界中过去长期流行着这样一种很不科学的观念：仿佛文章中所使用的材料愈多，引证愈多，就愈显得作者博学，文章的学术性也愈高。尽管作者自己并没有加上什么见解，但文章的价值也仍然很高。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作出了千篇都是材料堆积和引证的长文章，作者自己既洋洋得意，读者也觉得作者博学高深。于是相习成风，竟成为一种风气。这样的文风也曾长期在我国学术界流行过。在史学界，由于研究的对象特殊，这种重材料轻理论，喜欢大量引用史料堆积材料的风气现在仍然存在，还有待大力扭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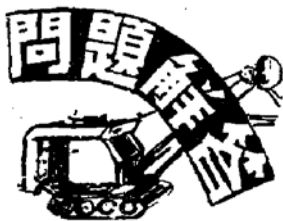
其实，大量堆积材料并不就等于博学。重材料轻理论，事实上只是资产阶级学者的治学方法，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治学方法上的表现。因为他们大量堆积材料，目的只在于吓唬别人，以显示自己的多才博学，从而抬高自己的地位。我们知道，材料之所以必要和可贵，全在于它能充分说明情况，从而给作者提供作出判断和推论的可靠根据。如果材料的使用超出了上述范围，甚至脱离了目的而变成了大量的堆积，那就将变成毫无意义的了。这样的大量堆积材料，决不是文章的价值所在，不是文章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而是文章的累赘，按照医学的原理，这原是要动手术割掉的。可是那些重材料轻理论分析的学者们，都把这些要开刀割掉的累赘当作高级化妆品，象少女们搽胭脂一样要用它来把自己打扮成“博学”的外貌。按说，累赘就要割掉，这原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事实上却又恰恰相反，很多学者们不自觉地陷在材料堆中，乐于搞一些繁琐的考证，以致连自己也完全被材料束缚住，而不是自己支配材料，这就完全把事情的本末倒置了。为什么竟会是这个样子呢？关键还是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问题上：为了显示自己博学，想由此成名得利，以致竟嗜痂成性不能自拔。有一些个别的所谓“博学”的“学者”，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而故弄玄虚，故意引许多外文版本的书籍作注，甚至已有较好的中译本了也还要引用各种外文版本为注，弄得读者莫名其妙，而作者也就似乎更加高深渊博了。例如右派分子林里夫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歪曲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的“论文”时，就是使用这种手法的，可算是这种类型的典

型。

真的博学其实并不在于作者在论述某一问题时大量堆积各种材料或使用前人未发现过的什么新材料，而在于作者确实能够在许多问题上恰如其份地使用经过选择、最有代表性和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在于作者确实能够支配这些材料，作出理论分析，正确而中肯地说明问题。没有理论分析，不说明问题，而只有堆积材料的“论文”，实际上还未正式进入研究领域，和真正的博学还有着遥远的距离。在社会主义下，资产阶级那一套治学方法是驯不了人的，今后肯定是沒有市场了，人们在评价科学研究成果时，决不会把材料多少和材料新从来当作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标准。

重材料而轻视理论，除了上述想显示个人博学这种腐朽思想作祟外，还由于这些学者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们认为沒有馬列主义理论，光靠材料，也能做出好文章。他们对一些所谓享有盛名的资产阶级专家迷信崇拜，并把他们捧出来作为重材料轻理论，抵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挡箭牌。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掌握了大量材料固然是一个长处，但沒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论为指导，这一大堆材料就将变成废物。因为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社会历史和现实社会现象，就将陷入唯心主义的错误中，从而决不可能从这些材料作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任何轻视理论的倾向都是错误的。愈是轻视理论，离开真正的博学就愈是远。

当然，我们批判重材料轻理论的观点，提倡既要掌握材料又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重视研究中的理论分析工作，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搬用一些馬列主义的原理和词句来作装饰用，或未经理消化而死搬硬套地大量引证经典著作当作理论分析。我们一样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那种一味引证经典著作，作者不加任何见解，由大剪刀剪裁经典著作来做文章的倾向。因为这样并不能算作理论分析。要彻底克服重材料轻理论的错误，唯一的办法是認真进行思想改造，把资产阶级的白旗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認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問：你刊連續刊載了有關“陳白沙哲學思想”的討論文章數篇，到底陳白沙是怎樣一個人？

讀者 曾啟佑

答：中國理學從宋代發展到明代，即被封建帝王利用做為鞏固其專制政權的工具。如明成祖曾命翰林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編撰五經四書和宋儒性理大全，頒布學校，後又規定士子誦習程、朱的四書釋義，所以“理學”幾乎成為當時的“官學”。

可是當時的儒者，對理學無甚新見解，凡所著述無不“一稟宋人成說”，“恪守宋人矩矱”，“故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彼亦一述‘朱’，此亦一述‘朱’耳”。（黃梨洲語）

據說到陳白沙出現時，明代理學“始入精微”。黃梨洲還稱贊白沙為“獨開門戶，超然不凡”（明儒學案）。由此可見我國學者對陳白沙在明代學術地位的評價是相當高的。

白沙是十五世紀的人，原名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廣東新會縣人。明宣德3年10月21日（公元1428年），誕生該縣城北圭峰山下都會村。他是遺腹子，由他母親林氏守節撫養長大。後來他遷居于新會縣的白沙村（近江門），因而學者稱他為白沙先生。

白沙20歲便中了鄉試第九名舉人，入京會試不第，即轉往江西小坡從當代大儒吳康齋學習。

據說“激勵之功，多得之康齋”（白沙弟子張詡語）。

白沙游學歸來，閉戶讀書，在學問上無所得，便築春陽台，靜坐其中，久之才領悟此心與此理有湊泊處。於是以為作聖工夫，是從靜坐中得來。

白沙39歲時（成化2年即公元1466年），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見他和宋儒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以為真儒復出，為他宣傳，結果一時名流：如羅一鋒，章楓山，庄定山，賀醫閩等，皆與相交；賀醫閩更執弟子之禮，拜他為師。及歸粵，四方來學者日益眾。江西白鹿洞書院，延請他去主講，他以母老辭謝不往。

白沙56歲時（明成化19年公元1483年），廣東布政使彭韶和都御史朱英上疏荐他做官，說他是醇儒，恐國家坐失為賢之寶。疏聞，召他入京，令就試吏部。可是他推辭有病，不肯應試，疏請回家養病和待奉母親。明憲宗遂賜他為“翰林院檢討”官銜而歸。以後便長期在鄉講學。

白沙弟子甚多，最著名者：如湛甘泉、張詡、賀醫閩等。

白沙母親死於明弘治8年（公元1494年）享壽91歲。這年白沙為68歲，過了5年，白沙73歲，（明弘治13年即公元1500年）遂與世長辭了。他的遺體葬在圭峰山。到了明萬曆14年（公元1556年）入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諡文恭。觀此，可知白沙生平的一個概略了。

（思）

本刊降低售價啟事

為適應全國文化大躍進的要求，本刊決定降低售價，自七月號起，每冊售價式角五分，即比原定價（三角）降低五分，但篇幅不減。凡已按原定價訂閱者，多餘定款，均由當地郵局辦理退款手續，敬希訂戶留意。自本年第三季開始，每季訂價為七角五分，半年為壹元伍角，全年為三元。

理論與實踐雜誌社

58年7月15日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投稿。

(二) 本刊特别欢迎下述性质的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

2. 批判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的著作；

4. 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稿長一般不超过一万字。来稿請用稿紙謄写清楚，并示詳細地址。不拟采用的稿件，負責退还。

(四) 来稿发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請寄：广州市德宣西路广东科学館內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理论与 实践

月 刊

1958年第7期(总第7期)
編輯者: 理論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德宣西路广东科学館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8年7月15日出版
印刷者: 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本刊代号: 46—27

刊号: (穗)0363

印张: 3 $\frac{1}{2}$

定价: 每册二角五分